

「睡獅」淵源的再商榷與新探索： 誕生於明治日本的「眠れる獅子」

楊瑞松*

儘管睡獅符號經常出現在當代中外的公共論述中，而所謂拿破崙的中國睡獅論更是中外政要口中所津津樂道的歷史典故；可是嚴謹的歷史學研究成果，卻是和一般大眾的認知有相當大的落差。首先，國內外對於睡獅議題有深入研究的代表性學者均一致地指出，現存的文獻資料並無法佐證拿破崙曾經以「睡眠」或「睡獅」的比喻談論過中國。此外，學界在2016年以前的研究，也幾乎都指梁啟超才是首先在1899年提出以「睡獅」來比喻中國的看法。然而，在拙作〈從「眠獅」到「睡獅」：梁啟超睡獅說淵源新論〉（發表於2016年），我發現日本人大澤龍早在1898年即曾提及曾紀澤以睡獅喻中國的講法，進而指出明治日本時期的中國觀和國家動物符號想像，和「中國為睡獅」論述的出現有密切關連性。

但是，很遺憾地，國內外後續的研究均還是集中就梁啟超的文本來探討「睡獅」的淵源課題；相對地，我的後續研究發現有更多明確的日文文獻證據可證明「睡獅」出現在明治日本的甲午戰爭時期。因此，本文的前半段將檢討商榷若干「睡獅」新研究，因糾結於梁啟超文獻而造成詮釋上之盲點和缺點。後半段的重點則是引介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

通訊地址：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分析若干重大意義的日本文獻資料，說明所謂「中國為睡獅」的說法，最早乃見於甲午戰爭時期的日本公共論述；並深入剖析以明治日本的另類「東方主義論述」模式，如何在日本原先關於中國的「獅子」比喻的背景下，造就「中國是睡獅」的說法誕生於此特殊的時空背景。本研究對於「睡獅」淵源課題的重大發現和詮釋，不僅說明它曲折且富戲劇性的符號意涵演變史，更充分展示了跨語境和跨文化的知識符號傳播的高度複雜性和曖昧性。

關鍵詞：睡獅、梁啟超、曾紀澤、甲午戰爭、明治日本

一、問題的緣起

2014年3月2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結束他訪問法國的行程的告別演說中，作了以下的陳述：

拿破崙說過，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當這頭睡獅醒來時，世界都會為之發抖。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¹

這一段話不僅是作為中國對外宣傳，表達友好善意的訊息，同時也試圖挪用拿破崙的中國睡獅論，轉而配合所謂當代中國「和平崛起」的論述，從而定位覺醒的獅子乃是和平友善，並不會具有威脅性。從宣傳效果而言，這種以當代西方人並不陌生的中國睡獅論為基底，但卻將其重新詮釋的論述，自然有拉近彼此距離並且吸引媒體討論的效應。²事實上，睡獅符號在當代中國的政治論述不僅僅是在外交辭令上的運用而已；在對內的宣傳上，它也是官方樂意援引的符號，用來描述近代中國的巨大蛻變，尤其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進步發展。例如在不久前，為了慶祝中共建黨一百年，由任仲平署名並被廣泛刊行於各類官方和非官方網頁上的一篇祝賀文章：〈百年輝煌，砥礪初心向復興：寫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即以睡獅破題來歌誦共產黨的領導統御：

睡獅破濃夢，病國起沉疴，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人以壯烈的犧牲，堅強的意志，豪邁的氣概，無私的情懷，點燃精神的火種，挺起民族的脊梁，振雄風於委頓，發抖擻於頹唐，讓中國人的精神由被動變為主動，由消極變為積極，由悲觀變為樂觀，由自卑變為自強。舊染既除，新機重啟，中國人由此在精神上獲得了自由和解放，這是百年來

¹ 葉靖斯，〈習近平總結法國訪問：中國「睡獅已醒」〉，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03/140328_china_france_xi，
擷取日期：2021年6月7日。

² 例如前歐洲國會議長(European Parliament President)Josep Borrell於2006年7月5日在接受中國新華社訪問時，也曾援引拿破崙，以“Napoleon said China is a sleeping lion, but I think now China is a lion awakening.”來表達他對於當代中國的看法。參見：
<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xw/t261759.htm>，擷取日期：2021年6月20日。

中國精神發生的最顯著，最偉大的變革，也是一個走過漫長歷史的古老民族心靈世界最壯麗的篇章。³

然而，儘管睡獅符號經常出現在當代中外的公共論述中，而且所謂拿破崙的中國睡獅論更是中外政要口中津津樂道的歷史典故；可是從嚴謹的歷史學研究角度而言，有關睡獅符號的相關議題，學界研究成果卻和一般大眾的認知有相當大的落差。首先，國內外對於睡獅議題有深入研究的代表性學者，例如：單正平、施愛東、石川禎浩、楊瑞松、Wagner(瓦格納)、Fitzgerald(費約翰)等學者均一致地指出，現存的文獻資料並無法佐證拿破崙曾經以「睡眠」的比喻談論過中國，更遑論以「睡獅」來形容中國。⁴再者，有關以「睡獅」符號明確地來形容中國的用法的始作俑者，學界在 2016 年以前的研究，也幾乎都指向梁啟超，尤其是聚焦於他在 1899 年 4 月發表於《清議報》的〈動物談〉。公認為其中「昔支那公使曾侯紀澤，譯其名謂之睡獅，又謂之先睡後醒之巨物」的這段話中的睡獅符號，正是睡獅符號在所有中外文獻中被用於形容中國的首次亮相。也正因為如此，單正平和石川禎浩花了相當多心力，企圖釐清何以梁啟超會突發奇想，以「睡獅」之喻來形容中國。很可惜的是，無論是單正平和石川禎浩，終究無法提出令人滿意和信服的解釋。也因此，石川禎浩在其論文的結語中表達對此情況的無奈之情：

³ 任仲平，〈百年輝煌，砥礪初心向復興：寫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21/0628/c40531-32142075.html>，擷取日期：2021年7月11日。

⁴ 單正平，〈近代思想文化語境中的醒獅形象〉，《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天津，2006.07)，頁29-36，及其專著：《晚清民族主義與文學轉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113-145。石川禎浩，〈晚清「睡獅」形象探源〉，《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廣州，2009.10)，頁87-96，及其日文原作：〈眠れる獅子(睡獅)と梁啟超〉，《東方學報》，第85冊(京都，2010.03)，頁479-509。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政大出版社，2016)，頁109-137。施愛東，〈拿破崙睡獅論：一則層累造成的民族寓言〉，《民族藝術》，第3期(南寧，2010.09)，頁8-16。Rudolf G. Wagner, "China 'Asleep' and 'Awakening'. A Study in Conceptualizing Asymmetry and Coping with It," *Transcultural Studies*, no.1(March, 2011): 4-139. John Fitzgerald, "'Lands of the East Awake!': Christian Motifs in Early Chinese Nationalism," 收入黃克武、張哲嘉主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361-410。

假如他(梁啟超)留下一篇〈醒獅有感〉之類的文章，我們也就可以瞭解「睡獅」形象出現在中國的來龍去脈，特別是本文未能解明的梁的想像由怪物弗蘭肯斯坦(佛蘭金仙)到獅子的飛躍過程。但遺憾的是，梁啟超沒有為我們留下這樣的文章。如此，來歷依然不明的「睡獅」、「醒獅」的形象後來不斷被放大和強化，直至現在。⁵

拙作〈從「眠獅」到「睡獅」：梁啟超睡獅說淵源新論〉(發表於2016年)，正是企圖在我新發現的史料基礎上，針對上述石川禎浩所描述的「來歷依然不明的『睡獅』」的研究困境，提出新的解釋，讓我們對於「睡獅」的來龍去脈有更進一步的瞭解。簡言之，在該篇論文中，我認為刊行於1898年5月1日的《知新報》上的翻譯文〈日人大澤龍論中國情勢〉(其中包含「往者曾紀澤嘗比支那於眠獅」行文)，應被視為在中文的語境中，第一篇出現以睡獅符號來代表中國的文本，同時也是梁啟超睡獅符號的靈感來源。此外，此一新發現也表示明治日本時期的中國觀和國家動物符號想像，以及關於曾紀澤論述的種種相關評論，均和「中國為眠獅/睡獅」論述的出現有密切關連性。⁶

上述的論點，可謂是在過往的研究基礎上，對於睡獅符號淵源的探索方向，跨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也在次年發表的相同主題的英文論文中，提出同樣的論點，希望能藉此引起學界對此課題有興趣的學者之注意，能夠接續我所揭櫫的研究方向，因而對此議題提出更進一步的研究發現以造福學界。⁷

但是很遺憾地，在拙作中英文版問市後的四、五年間內，雖然陸續有不少中外著作針對此議題持續探討，但是它們不僅沒有接受或注意到我所提出的研究新方向，卻反而提出一些令人難以信服的論點和解釋。與此同時，我自己的後續研究，尤其是有關明治日本時期文獻資料的蒐羅和解讀，卻有令人相當驚喜的發現，足以更進一步地證明我先前所揭示的研究新方向的正

⁵ 石川禎浩，〈晚清「睡獅」形象探源〉，頁96。

⁶ 楊瑞松，〈從「眠獅」到「睡獅」：梁啟超睡獅說淵源新論〉，《思與言》，第54卷第1期(臺北，2016)，頁231-265。

⁷ Jui-sung Yang, "Where Does the Lion Come From? On the Origin of Liang Qichao's Sleeping Lion Symbol,"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vol.24, Issue 2(October, 2017): 131-145.

確性，而這也是本文即將論辯的重點主題。但是在進入主題之前，我們不妨先檢視近年來一些代表性的相關著作，逐一檢視商榷它們論點的盲點和漏洞，從而對比彰顯出我所要提出的新論點的重要性和說服力。

二、「梁啟超陷阱」：種種糾結於梁啟超論述的「睡獅」溯源臆測

誠如上述，在我於 2016 年發表的論文〈從「眠獅」到「睡獅」〉中，我即已指出日本人大澤龍在約早於梁啟超一年之前，就已經使用中國為睡獅的行文。也正因為如此，梁啟超極有可能只是使用此符號比喻中國的論述傳播鏈的一環(但可能是重要的一環，因為他在當時思想界的重大影響力，使得後人紛紛效尤，開啟了中文語境中睡獅符號蔚為風尚的現象)，而其上游的傳播鏈的流變情況則是發生在十九世紀晚期的明治日本公共論述。在此新認知的基礎上，任何日後企圖解答睡獅符號起源的研究工作，如果持續在梁啟超本身的論述上打轉，不僅意義不大，也很難超越單正平和石川禎浩所已嘗試過的種種在文獻上的考證分析努力。不過，以下所要商榷的三項代表性後續研究，卻依舊被此種可謂「梁啟超陷阱」的框架所困，因而得出種種缺乏說服力的推論臆測。

Heinrich 在其 2018 年出版的英文專著的第一章以“Frankenstein, the Sleeping L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a Biopolitical Aesthetics”為題，針對「睡獅」的來源提出他的一番見解。⁸首先必須指出的是，雖然 Heinrich 主要的研究領域是醫療史相關的課題，但是他顯然對於近代中國國族代表性符號議題也深感興趣。在他前一部專著中，他即是針對「病夫」(Sick Man)符號的起源提出的想法。⁹

⁸ Larissa N. Heinrich, *Chinese Surplu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25-47.

⁹ 他最主要的論證為中國畫家關喬昌(英文名：Lam Qua)在十九世紀中期時，應西方傳教士之請，所繪製一百多幅的中國病人身體畫像。Heinrich認為這些充滿怪異形象的畫作流傳至西方後，成為日後西方視中國人為Sick Man of Asia的想像淵源。Heinrich將西方人所建構的此種形象界定為「一個持續性的對中國國族的浪漫與帝國主義式的刻板印象，在此印象中國族特質和種族早就永遠是病態的，而這些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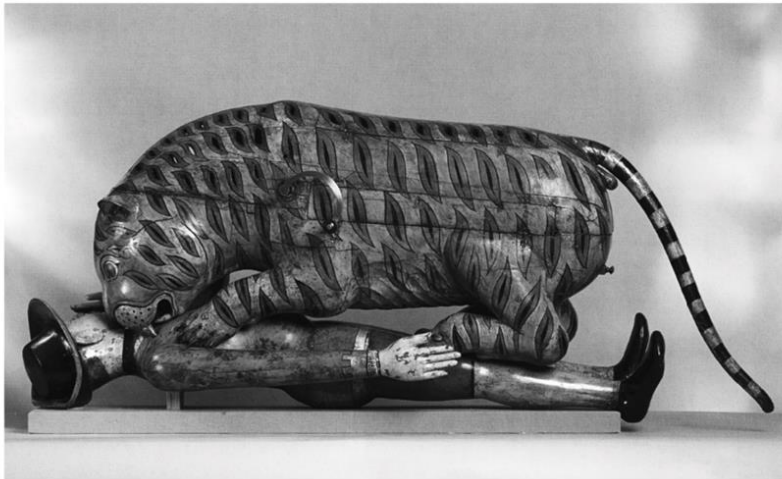
在我個人的專著《病夫、黃禍與睡獅》中，我曾仔細批評 Heinrich 關於「病夫」的推論，並總結他的看法「雖然頗有創意，卻是建基於非常薄弱的論證基礎上」。¹⁰很遺憾地，同樣的毛病也顯現在他關於「睡獅」淵源的推論上。雖然 Heinrich 對於相關的二手研究似乎都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上述 Wagner、石川禎浩和我等人的中英文著作，甚至我在 2016 年發表的相關新作，都有出現在他的注釋參考著作中，尤其他的很多論述也都是借鏡 Wagner 和石川禎浩的論點，但是他關於「睡獅」淵源的重大推論，卻是建立在他對於梁啟超〈動物談〉中的開頭這一段敘述：「吾昔遊倫敦博物院，有人製之怪物焉，狀若獅子，然偃臥無生動氣。」¹¹的大膽詮釋。Heinrich 公開駁斥石川禎浩將梁啟超的〈動物談〉視為是虛構想像的寓言的看法；相反地，他認為梁啟超筆下的倫敦博物院，乃是 Victorian and Albert Museum，而其中所謂「人製之怪物」，即是該博物院所展示的名為 Tipu's Tiger 之機械虎(參見附圖 1)。Heinrich 進而花了不少篇幅在介紹這個機械虎的展示歷史的來龍去脈，企圖說服讀者們這個 Tipu's Tiger 即是梁氏筆下睡獅的 index case/patient zero，亦即梁啟超睡獅的靈感來源乃是此英國博物館的展示物。儘管此展示物的主角明顯地是一頭老虎，但 Heinrich 卻又援引 Wagner 研究中一個 1911 年的漫畫，其中是以老虎來代表中國案例，來佐證以獅和虎的形象互換來比喻中國的手法並非是梁啟超的特例。Heinrich 甚至認為梁氏之所以運用「狀若獅子」的行文(暗示他明白原物並非是真正獅子)，更是所謂運用獅、虎形象互換手法的

(關喬昌的畫作)不僅製造了一個病態的中國文化特質，並描述了一個治癒之道」。Larissa N. Heinrich, *The Afterlife of Images: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70.

¹⁰ 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頁 7-9。

¹¹ 〈動物談〉全文為：「吾昔遊倫敦博物院，有人製之怪物焉，狀若獅子，然偃臥無生動氣。或語餘曰：子無輕視此物，其內有機焉，一撥揆之，則張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敵也。余詢其名，其人曰：英語謂之佛蘭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紀澤，譯其名謂之睡獅，又謂之先睡後醒之巨物。余試撥其機，則動力未發而機忽坼，螫吾手焉。蓋其機廢置已久，既就銹蝕，而又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機，則此佛蘭金仙者，將長睡不醒矣。惜哉！」。參見《清議報》(橫濱)，第 13 冊，1899 年 4 月 30 日，今收入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第 1 冊，頁 361。

另一種印證。¹²



1.1 *Tipu's Tiger*.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附圖1：Tipu's Tiger轉引自：Heinrich, Larissa, *Chinese Surplu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38.

然而，Heinrich 上述的「大膽假設」的論述方式，可謂是他自己心中自由聯想和臆測的產物。他將 Tipu's Tiger 這個歷史文物，突然天外一筆，帶入比附梁啟超寓言故事中的「人製之怪物」，從而斷定這個歷史文物乃是梁啟超睡獅靈感的來源之詮釋手法，可謂是詮釋暴力(*interpreting violence*)的極致展現。歸根究柢，他的根本問題即是完全沒有提出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文獻證據來支持他的這項推斷。簡言之，從頭到尾，Heinrich 完全沒有展示任何直接/間接的文獻資料能夠說明梁啟超，甚或曾紀澤，在他們的生活和思想上有和 Tipu's Tiger 產生過任何的連結(例如他們曾經評論過此歷史文文物，或是耳聞過有關此文物的隻字片語等文字紀錄)。事實上，當 Heinrich 企圖以「狀若獅子」行文，來推論梁氏可能心中早就明白 Tipu's Tiger 並不是獅子，因此才會以「狀若」二字去形容此文物的解釋，反而應是種倒果為因的詮釋。因為，根據

¹² Larissa N. Heinrich, *Chinese Surplus*, 36-41.

我先前的研究，梁啟超已經從他處得知睡獅的比喻用法，因此，在他筆下的寓言故事開端的「人製之怪物」(不論其創作的依據是否真得是來自 Tipu's Tiger)，均必得是「狀若獅子」以配合他已經預設好的「睡獅」比喻。換言之，是先有了「睡獅」主題的確定，才有所謂「倫敦博物院中，狀若獅子的人製之怪物」開頭鋪陳，而並非是如 Heinrich 所宣稱的因果關係：梁啟超是從 Tipu's Tiger 得到靈感，從而創造出了「睡獅」的符號。

Heinrich 推斷合理性的極限，頂多只能說，因為他注意到 Tipu's Tiger 之造型和存放地點和梁氏筆下所謂倫敦博物館的人製怪物兩者之間有若合符節之處，因此梁氏的這段敘述或許有可能是源自於他曾聽聞過 Tipu's Tiger 的事蹟(儘管這樣推論本身仍是需要文獻證據加以佐證)。但是，即使上述推論為真，在沒有相關史料的基礎上，任何企圖再超越此推論極限的更進一步論斷均是臆測遐想。例如他依舊無法進一步去解釋為何梁啟超要將此歷史文物改名為「睡獅」來比喻中國。上述 Wagner 漫畫的例子，只是顯示也有人以虎的形象來比喻中國，卻不能解釋為是漫畫家原先明明想到獅，卻特意以虎的形象來作畫的所謂獅、虎互換的表達手法的另一案例。事實上，所謂在中國的論述傳統中有將獅、虎互換的表述手法也根本毫無依據。¹³但 Heinrich 卻用此種過度詮釋的說法，企圖說服讀者，梁啟超也是依照這種所謂獅、虎互換的邏輯，把他可能聽聞過的老虎形象，轉換為以獅子的模樣來表述。這同樣也是一廂情願地臆測推論。更何況，Tipu's Tiger 真正的整體造型乃是一頭凶猛的老虎將一名歐洲人狠狠地撲倒在地的模樣，不僅和梁氏〈動物談〉後續的描述有所落差，更和睡獅的意象大異其趣。綜而言之，因為 Heinrich 在非常薄弱的文獻史料基礎上，持續在梁啟超的〈動物談〉上打轉糾結，企圖以其中一些行文和歷史文物之間的類比，進而大膽地推演出「睡獅」的起源，但卻完全無視於我已經揭櫫的明治日本公共論述對此議題的重要相關性，所

¹³ 在二十世紀之後，因為受到西洋和日本藝術風格以及博物館展演方式的影響，近代中國的確出現以獅和虎代表力量的藝文繪畫形式。可是，這樣的表述方式卻不存在於二十世紀之前，自然也無法運用在解釋十九世紀晚期梁啟超的創作邏輯，有關此藝術風格演變的詳細討論參見郭偉其，〈醒獅與猛虎：重讀何香凝的象徵圖像〉，《藝術史研究》(廣州，2020.12)，頁55-73。

以我們不得不說，他所推出的論斷不過是我所謂的「梁啟超陷阱」下的犧牲品。

接下來要討論的另一部相關作品，是由一位美術史背景的專家郭偉其在 2020 年底所發表的佳作：〈醒獅與猛虎：重讀何香凝的象徵圖像〉。從本文的標題乍看之下，並不會意識到本文會和「睡獅」的議題直接相關，可是作者卻在文中花了不少篇幅引介和此課題相關的研究成果(石川禎浩、單正平和費約翰等)，甚至包含了我在 2015 年底發表於復旦大學的會議論文(其中簡述了我在 2016 年發表的新論點)。在此討論基礎上，作者本身試圖以其專業背景知識，尤其是佛教藝術史和民俗表演方面的知識，企圖從梁啟超文中的「法蘭金仙」一詞，來推論「睡獅」符號的淵源。雖然作者在文末自承「因為許多關鍵證據的缺失，本文的論述還完全談不上實證，只能說是對各種相關背景進行必要的描述」，¹⁴但其論點可謂是目前最新的相關見解，因此仍有值得討論商榷之處。

根據作者的解釋，「佛蘭金仙」一詞，首先是嚴復用來翻譯 *Frankenstein*，之後由梁啟超在他自己的著作指出，乃是「一個特別喜慶譯名」，因為「當晚清的士人乃至普通老百姓看到『金仙』二字，他們首先想到的應該是這些佛道神仙以及相關的祥瑞物。至於『佛蘭』，在字面上即給有關佛教的印象……總之在晚清人看來，『佛蘭』像極了一個與佛教有關的地名」。¹⁵

基於上述對於「佛蘭金仙」一詞非常正面性的詮釋，作者接著推論說：「如果說要在中國古今歷史上找到一種由西方傳入，與佛教關係密切，並且『金光閃閃』的動物，那麼大概找不到比獅子更加完美的案例了。」¹⁶作者進而介紹佛教傳統中，形形色色的獅子意象，同時更以在民俗舞獅表演中有「瑞獅」的稱謂，而在粵語中，「瑞獅」和「睡獅」同音等現象，來推論梁啟超何以使用「睡獅」二字。¹⁷同樣地，上述這些非常有「想像力」的推論，也是企圖從梁啟超文本中的蛛絲馬跡線索，去推論出「睡獅」的由來。不同於

¹⁴ 郭偉其，〈醒獅與猛虎：重讀何香凝的象徵圖像〉，頁 71。

¹⁵ 郭偉其，〈醒獅與猛虎：重讀何香凝的象徵圖像〉，頁 64-65。

¹⁶ 郭偉其，〈醒獅與猛虎：重讀何香凝的象徵圖像〉，頁 65。

¹⁷ 郭偉其，〈醒獅與猛虎：重讀何香凝的象徵圖像〉，頁 67。

Heinrich 緊咬「人製之怪物」大作文章，郭偉其則是以美化「佛蘭金仙」字面意義，再將與佛教文化連結，從而再轉而連結到獅子。

但是，郭偉其的以上推論卻暴露了若干顯著的盲點。首先，無論是嚴復或是梁啟超在他們提及「佛蘭金仙」時，都是和「怪物」一詞並陳。他們均是以相當負面的行文來形容他們筆下所描述的「佛蘭金仙」姿態(嚴復：「佛蘭金仙怪物者，傀儡耶，……機關振觸，則跳躍殺人，莫之敢當」；梁啟超：「張牙舞爪，以搏以噬」)，而非如郭偉其所稱的喜慶祥瑞物之姿。¹⁸更重要的是，梁、嚴二人也均無其他將 Frankenstein 與佛教事物相連結的論述。由此觀之，郭偉其的一連串推論詮釋，乃是建基於他對於「佛蘭金仙」一詞字義推演，但是卻無法提出更多的文獻證據來佐證其論證，毋怪他在最後結論中也不得自承自己的論點仍有重大缺失。¹⁹究其原因，也正是因為他為「梁啟超陷阱」所困，成為近期第二位汲汲於從梁啟超的有限文本論述中，試圖推論出「睡獅」可能出處的失敗詮釋者。

最後一篇在近期發表而且值得商榷其論點的相關著作為王今所撰寫之〈龍與獅——晚清國族想像及其論述變遷〉。²⁰此文整理分析各類關於龍和獅作為國族象徵的論述，但其中一段論述卻是發前人所未言，值得進一步地關注討論。作者本身在援用先前各位相關學者研究共識，認為梁啟超，而非拿破崙，乃是中外人中使用睡獅符號的第一人(他並未參考我 2016 年的文章之新觀點)之見解後，隨即話鋒一轉，作以下的表述：

筆者考證發現，早在 1896 年，梁啟超便在給劉鶚的《京郊感懷》的和詩中寫道：「自古文明第一州，臥獅常在睡鄉遊。狂瀾不抵中流柱，舉國將成破碎裘。燕雀同居危塊壘，蜺螭空畫舊牆樓。漏卮真似西風

¹⁸ 嚴復的評語在其對〈如後患何〉的按語，參見王學廉譯，〈如後患何〉，《國聞報》(天津)，1898年3月22日。

¹⁹ 事實上，郭偉其在分析本文的主角何香凝的繪畫風格上，反而能夠密切注意到近代日本畫風對何的影響。很可惜地，當他在解析「睡獅」議題時，卻完全忽略近代日本因素的重要相關性。見其對何香凝畫風的主要分析於〈醒獅與猛虎：重讀何香凝的象徵圖像〉，頁55-61。

²⁰ 王今，〈龍與獅——晚清國族想像及其論述變遷〉，《漢語言文學研究》，第2期(開封，2019.06)，頁54-62。

岸，百孔千瘡無底愁。」「睡獅」明顯象徵的是當時的中國。聯繫後面的詩句，可知詩中所寫的是甲午之後，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境遇，無人能力挽狂瀾，整個國家將要成為破碎的裘衣，人們的命運如同居住在高土堆上的燕雀和舊牆樓裡的蝸牛一樣。而臥獅仍然沉浸在文明第一州的夢中，詩人心中的愁深不見底。這個「睡獅」形象重點是在「睡」上，背後指向的是安於現狀，是個較為負面的形象。這恰好吻合了當時西方盛行的sleeping china的說法。19世紀的西方思想界，常將中國描述為「沉睡的巨人」，以此來表達中國文明處於停滯的狀態，與順應歷史發展的進步的西方形成了鮮明對比。但在更深的一層，也暗含了詩人對獅子醒來的期待。²¹

以上這一番陳述，有幾個相當值得關注的點：首先是時間(1896年)，其次是所謂梁啟超和詩的第一句(自古文明第一州)，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當然是和詩的第二句(臥獅常在睡鄉遊)。王今對這一首和詩的解釋，當然也是緊扣第二句，並幾乎直接以「睡獅」來解釋詩中的「臥獅」二字。的確，平心而論，因為第二句中的臥獅之後又有睡鄉遊的語句，所以王今這樣的詮釋有其合理之處。再考量到作詩的年代為1896年，比目前大家所一直聚焦的梁啟超〈動物談〉早了三年多，如果此一文獻有其可靠性，那無疑將梁啟超(長期來已被學界視為睡獅符號之創造者)的睡獅符號創作時間點，一下往前推進三年多的時間。如此一來，對於當今學界關於梁啟超在這議題上扮演的重要角色，無疑是一革命性的研究突破。²²

不過，如果我們根據王今的註釋，仔細檢視王今所引用的這一首梁啟超和詩的出處，則有若干疑點尚待進一步澄清。首先，王今提供兩條資料出處書目為1980年出版的《老殘遊記年譜》(原書名應是《劉鶚年譜》)和1987年出版的《劉鶚小傳》。²³很明顯地，這兩部著作都是和劉鶚直接相關，均不是關

²¹ 王今，〈龍與獅——晚清國族想像及其論述變遷〉，頁56。

²² 就我所知，所有研究此議題的中外學者(包含我本身在內)，均沒有注意和運用過這一首號稱是梁啟超在1896年所作的和詩為材料來探討睡獅的出處淵源。

²³ 梁啟超的和詩分別刊載於蔣逸雪，《劉鶚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80)，頁27；劉德隆、朱禧、劉德平，《劉鶚小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頁93。

於梁啟超的相關著作。這也間接說明了，何以幾乎其他研究此課題的學者均沒有引用過此資料，因為在目前有關梁啟超的著作、生平、年譜、全集、合集等等出版品中，均未收入這一條號稱為梁啟超著作的史料。而如果我們再進一步檢視上述兩部劉鶚著作中關於此和詩的陳述，又得到下列的資訊：

(一)、兩部著作的確都明言這是梁啟超在 1896 年所著的和詩。但只有《劉鶚小傳》有註明其詩出處是來自劉蕙孫所編之《鐵雲先生年譜長編》(濟南：齊魯書社，1982)的第 36 頁。但是詳讀此頁關於劉鶚在光緒二十二年(1896 年)的活動的資訊，其中並未刊載梁氏和詩的全文內容。²⁴但卻有編者按語如下：「一九五七年我弟厚澤在上海清理從叔大鈞存書，曾發現抄存稿。共有汪穰卿(康年)、梁任公(啟超)、宋芝洞(伯魯)、毛實君(慶蕃)、黃錫朋(葆年)、羅式如(振玉)諸人唱和六首。」

(二)、《劉鶚小傳》的作者們關於此和詩的歷史場景也有一番說明。²⁵其中一段話值得注意：「梁啟超的詩，明顯要比劉鶚的詩更加沉痛，更加憤懣，

²⁴ 在京邸賦《春郊即目》詩二首，抵滬，南友多與唱和。次韻者，有汪康年、梁啟超、羅振玉諸人。按這一年鐵雲先生在京寓寫了兩首《郊遊即目》詩。其中第二首為：「可憐春色滿皇州，李子當年上國遊。青鳥不傳丹鳳詔，黃金空散黑貂裘。垂楊宛地聞嘶馬，芳草連天獨上樓。寂寞江山何處是，停雲流水兩悠悠」。到滬後，一些朋友們見到這首詩，多相唱和。

一九五七年我弟厚澤在上海清理從叔大鈞存書，曾發現抄存稿。共有汪穰卿(康年)、梁任公(啟超)、宋芝洞(伯魯)、毛實君(慶蕃)、黃錫朋(葆年)、羅式如(振玉)諸人唱和六首。八叔祖夢蓮亦有抄草，但缺汪穰卿而多出他自己和韻一首。據羅著《集夢編》說：「丙申年他在上海辦《農報》，汪穰卿也在上海辦《時務報》，聘梁任公作主筆。參見劉蕙孫，《鐵雲先生年譜長編》(濟南：齊魯書社，1982)，頁36。

²⁵ 三月，劉鶚途經上海時，梁啟超、汪康年、宋伯魯、毛慶蕃、黃葆年、羅振玉等都有和詩。可見此時劉鶚與梁啟超、宋伯魯已經相識，其中梁啟超的和詩是：「自古文明第一洲，臥獅常在睡鄉遊。狂瀾不砥中流柱，舉國將成破碎裘！燕雀同居危塊壘，蜉蝣空畫舊牆樓。漏卮真似西風岸，百孔千瘡無底愁」。其時劉鶚頗受朝野注意，欲圖南下修築鐵路，一展身手，正是躊躇滿志之時；而梁啟超卻因康有為「公車上書」遭陷，強學會又被強行解散，正為鼓吹維新而到處奔波。兩人處境不一，思想感情自然不可能一致。梁啟超的詩，明顯要比劉鶚的詩更加沉痛，更加憤懣，也更加深情。然而分歧雖然存在，憂國憂民的思想畢竟還是相通的，我們以為兩人的接近是完全可以想見的。遺憾的是，其他人的和詩，由於十年動亂，我們遍找不著，不然對了解和分析其他人當時的思想狀況，一定會很有幫助。參見劉德隆、朱禧、劉德平，《劉鶚小傳》，頁93。

也更加深情。然而分歧雖然存在，憂國憂民的思想畢竟還是相通的，我們以為兩人的接近是完全可以想見的。遺憾的是，其他人的和詩，由於十年動亂，我們遍找不著，不然對了解和分析其他人當時的思想狀況，一定會很有幫助。」

從以上所整理歸納的資訊可見，原來梁啟超和其他汪康年等人的和詩是劉家的後人在 1957 年時整理家族遺物時才發現的抄存稿。但是在經歷文革浩劫後，只有梁啟超的和詩殘留下來。換言之，作為王今所依據的重要史料的梁啟超詩作，是在 1957 年才戲劇性地出現，之後再被收錄在 1980 年代出版的劉鶚相關著作中。有鑑於這條史料出現的曲折歷程，我們要如何評量此詩作的可靠性和其證據性，甚至其真偽性？

的確，根據梁啟超的年譜，梁氏在 1896 年初是在上海沒錯，上述的文人雅士聚會應是有發生過的歷史事實。但是梁氏的年譜卻沒有任何關於此次聚會的記載，或是有關此和詩創造的隻字片語。簡言之，如果從梁啟超方面的現存史料而言，這一場聚會即使曾經發生過，也是一場被遺忘的歷史事件，當然更沒有任何上述和詩的記載。²⁶再者，在 1957 年才被發現的抄存稿中的所謂梁啟超和詩，其真偽性如何，恐怕仍須經過考證學家的仔細判讀檢證才能被認真對待。至少到目前為止，在 1980 年後所出版的有關梁啟超著作思想的編著，都並未將此詩收納為梁啟超的作品。²⁷

此外，若從「內部考證」的角度來商榷此和詩的真偽性，則至少有以下兩點值得考量。首先，第一句詩文「自古文明第一州」出現「文明」二字頗值得玩味。根據石川禎浩的研究，梁啟超是近代中國使用對應 civilization 意義的「文明」二字之第一人，而時間點正是 1896 年三月(文章為〈論中國直講求法律之學〉)。²⁸這與上述資訊所說明的和詩創作時間點一致，所以如果此和

²⁶ 根據《梁啟超年譜長編》，梁啟超 1896 年的活動是以當年七月要開辦的時務報為主，其中並沒有任何關於和劉鶚會面的記載。參見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一卷(1873-1899)，頁 51-66。

²⁷ 例如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李國俊編，《梁啟超著述繫年》(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以及齊全編，《梁啟超著述及學術活動繫年綱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均未有隻字片語提及此上海詩會或和詩內容。

²⁸ 石川禎浩，〈梁啟超與文明的視點〉，收入氏著，袁廣泉譯，《中國近代歷史的表

詩真得是梁氏在 1896 年三月間所作，他有可能急於在此時間點上即運用他所新認知的「文明」二字於其詩作上嗎？如此一來，他恐怕還得先花一番工夫和同座之人解釋他詩中所謂的「文明」之意。這是疑點之一。

疑點之二，則是在於第二句的「臥獅」二字。如果就引用典故而言，「臥龍」或是「臥虎」二字都有古典依據，但「臥獅」二字則看不出任何依據。從後見之明而言，是因為有了日後的「睡獅」一詞的流行，才使得「臥獅」二字乍看之下不會太唐突。否則，回到 1896 年的時間點上，考量在當時中文語境根本尚未出現以獅喻中國的歷史背景，「臥獅」二字想必也是會令當時同座之人，讀來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²⁹

上述的種種疑點，恐怕都有待更多的梁啟超研究專家以及詩文辨偽專家的參與檢視，方能對這一條在 1957 年才出現的梁啟超著作相關史料的真偽性和證據性有較明確的定論。若其被證實為偽，則所有關於梁啟超本身關於「睡獅」言論的研究又重新回到他 1899 年的〈動物談〉上；但若被證實為真，則種種關於梁啟超睡獅論的研究勢必得重新思考，將其相關思想系譜重新界定，包含探究「臥獅」二字從何而來。只是，不論此和詩的真偽如何，對於「睡獅」淵源探討的議題而言，它的意義事實上已經不太重要。原因正在於，如同我先前所指出，有更多的明確證據顯示，梁啟超不過是睡獅符號傳播鏈上的一環，真正的源頭，或者是說更早的論述，是出現在十九世紀晚期的明治日本。我將在下一節的討論中，依循著我先前發現的日本人大澤龍在 1898 年的陳述「往年曾紀澤嘗論支那比之於眠獅」³⁰所標示的研究線索，以明確的文獻證據展示「睡獅」真正淵源之所在，讓我們能夠早日擺脫關於此議題的「梁啟超陷阱」所造成種種研究紛擾。

與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98-99。

²⁹ 劉鶚的原詩第二句詩文為「季子當年上國遊」，很明顯地是引用上古春秋時期的典故，但所謂梁啟超的和詩，卻是運用相當新穎未知典故的「臥獅」來對應「季子」，如此對應作法也令人費解。

³⁰ 大澤龍，〈支那論〉，《中外時論》，第二號(東京：精神社，1898.02)，頁8。

三、「歷史三鑰」：曾紀澤、甲午戰爭、眠れる獅子

在我 2006 年發表的論文中，我曾經列舉了不少明治時期的知識人，例如福澤諭吉、竹越與三郎、柴四朗等人的作品說明，「象」和「獅子」均曾出現在明治日本時期的公共論述中被用來形容中國的情形。³¹這兩種動物可以說是日本本土論述中所自力發展出來的對中國他者(Chinese other)的動物符號代稱。相對而言，在十九世紀時期，歐美的公共論述並未有採用此兩種動物意象來表述中國。從日本的視角而言，以龐大體積的象來形容中國或作為中國的代稱，這樣的比喻方式並不令人意外。石川禎浩即指出，早在 1880 年，著名的記者岸田吟香在評論中國的情況時，即認為中國若能好好學習西方進行現代化，則「可說是大象突然從睡夢中覺醒的話，也會讓一旁的老虎捲起尾巴、四處奔竄吧」。³²這可謂是明治時期，以「睡象」來形容中國的先行者。

但另一方面，在日本文化傳統中，作為凶猛力量象徵的「獅子」何以也會被用來形容中國，則又有其微妙之處。簡言之，當「獅子」被用來形容中國時，它往往不是一種處於常態或中性的表述方式，而是以不同的形容詞來削弱，甚至否定獅子原有的威風，來表達中國即使是隻獅子，也是一隻有問題的獅子。福澤諭吉所論的「缺爪牙的獅子」³³以及柴四朗筆下的「病獅」³⁴都很明確地反應了明治知識圈以這種表述方式傳達他們對於衰敗的中國之輕蔑態度。³⁵此外，活躍於明治時期著名的政治人物島田三郎(1852-1923)，在

³¹ 楊瑞松，〈從「眠獅」到「睡獅」：梁啟超睡獅說淵源新論〉，頁231-265。

³² 石川禎浩，〈晚清「睡獅」形象探源〉，頁92。岸田之原文參見岸田吟香，〈吟香翁書牘之續〉，《朝野新聞》(東京)，1880年5月23日。原文前後文為：「李鴻章党の説益才行はれ遂に電信を架し鉄道を築き、鉱山を發掘し、器械を製造し、全土凡百の物、西洋の民法を悉く採用し、俄に大象の眠りを醒し候はば、是れ迄傍に戯れ居たる虎も俄かに尾を巻て奔竄せるを得ざるに至り」。

³³ 福澤諭吉，《兵論》(東京：飯田平作，1882)，頁29-30。

³⁴ 柴四朗，《佳人之奇遇》(東京：岩波書店，2006)，卷10，頁505。

³⁵ 詳細討論參見楊瑞松，〈從「眠獅」到「睡獅」：梁啟超睡獅說淵源新論〉，頁256-266。

他於 1896 年發表的政論文章「支那に対する政策何似」(對支那政策應該如何)，更是開宗明義地如此陳述：「死掉的獅子、睡著的大象，這些評價現在似乎更顯得明白不過。吾輩不須要問說它到底是死亡亦或是睡著，現在須要問的只是對於這個龐大的古老帝國，我們應採取什麼立場的問題。」(死したる獅子、眠れる象、是れ等の評言は今更に謂はずもがな。吾人は其死したると眠れるとの孰れを問はず今は唯た此尨大なる老帝国に対して如何の位置を取るべきかの問題を講究するの必要に迫まれる観のみ)。³⁶島田以「死獅」和「眠象」來界定當時他所看到的老大帝國之中國，可謂是將明治時期和中國最主要連結的兩種動物的負面形象發揮得淋漓盡致。

然而，如果島田此處的行文是「死象」和「眠獅」，那無疑就解決了我們的問題，完全證明了「睡獅/眠獅」明確地出現在比前述 1898 年大澤龍著作更早的明治時期論述。雖然，我們只能猜想或許在有些讀者的閱讀過程中，有可能將島田的兩種動物形象搞混，進而在傳播過程中製造出「睡獅/眠獅」的意象。但即使如此，這種閱讀詮釋所產生的可能效果，仍需有明確的文獻證據才足以證明「睡獅」的確誕生且流通於明治時期的公共論述。但是面對如同茫茫大海的明治時期文獻，我們又要如何大海撈針般地找到關鍵性的文獻證據呢？

所幸，我先前找到的關鍵史料，大澤龍在 1898 年發表的〈支那論〉，其實提供了重要的索引，為我們在龐雜的文獻資料堆中，開啟了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澤龍的文章中，他提到的「往年曾紀澤嘗論支那比之於眠獅」的句子，實際上是他在引述他所聽到的別人的說法中的一句話。他以「說者曰」的行文方式，將他所到的他人之言陳述如下：

說者曰：「支那政府猶抱不療之病疾者，雖國手大家不能治之。而支那人民又猶遊惰及於晚年者，希其懷臂奮起，樹革新之功，不異於百年待河清焉。往年曾紀澤嘗論支那比之於眠獅，當時泰西諸國，未詳其事情，以曾氏之論為真，然而及於甲午之役，連戰連敗。支那之真

³⁶ 島田三郎，〈支那に対する政策何似〉，《日本人》(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83)(原出版項為東京：政教社，1896.10)，卷14，頁281。

面目，始暴露於中外，於是乎曩之畏而逡巡者，爭先脅之，如英俄法德是也。今使日本助支那以抗諸國，譬如扶垂死人上角場，徒勞而已，何益之有，適足以速其死也。不若日本亦後於諸國，而得分一杯羹之為愈也。」³⁷

大澤龍對於中國的友善立場並非本文的關切之所在。³⁸但是他所謂的「他人的說法」帶出許多可能性。可能性之一是所謂「他人的說法」，實際上也是他自己行文上的技巧，是為了凸顯他自己的論點，而創造出來了的一種反面立場的說法。可能性之二則是「他人的說法」卻有其事，但其中的細節有可能是大澤龍自己杜撰，大澤龍主要是為反對要日本和西方列強採取同樣侵略中國的立場。可能性之三則是「他人的說法」不僅卻有其事，且其中的內容也大都是大澤龍所聽聞，他只是忠實地轉述他所反對的意見的說法。

在前兩種可能性中，文中有關「眠獅」的部分就都屬於大澤龍本身的創造，進一步的探討相關文本的可能來源就無意義。但我們若接受可能性之三為真，就可以從這則「他人的說法」的文本中，找到一些和「眠獅」密切關連的事物。這其中，甲午戰爭和曾紀澤無疑是和「睡獅」符號重要連結的時空背景和人物角色。³⁹而其中所述的西方列強對中國態度在甲午戰爭前後的

³⁷ 大澤龍，〈支那論〉，頁8。然而，大澤龍本身是反對上述講法中提議日本也和西方列強一樣一起去欺壓掠奪中國。他在引述上述講法後，馬上接著說：「嗟呼，是果何言，如說者則傲於強盜者也。夫泰西諸國皆強盜也。」

³⁸ 他在後續的論述中強調日本應扶持中國進行改革：「支那政府雖抱痼疾，能觀其脈，能候其氣，而投之以千金之良藥，豈有不一變之理。而其良藥則仁義是也。說者不勸日本之投藥，而欲得一杯羹，是何異見人立病夫枕上冷然不顧，且以其展轉哀號為樂，而已亦從而和之也。」大澤龍，〈支那論〉，頁9-10。

³⁹ 雖然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China, the Sleep and Awakening*)的內容分析和其引發的反應評論並非是本文的研究重點，但有些事實面向的釐清將有助於我們理解日後許多對它的理解和詮釋是沒有事實依據的：(1)、曾紀澤從未在此著作或他的其他文獻中，以「睡獅」來比喻中國。(2)、曾紀澤認為中國「不過似人酣睡，固非垂斃也」，並且指出中國自道光年間已漸漸清醒革新，在火燒圓明園的教訓後，更是已經驚醒且加速改革。所以對曾紀澤而言，中國沈睡的下一步乃是覺醒，而非如西方人所謂的邁向死亡和毀滅。(3)、曾紀澤保證驚醒後的中國並不會想報復西方列強，但要求西方列強正視改革覺醒後的中國，例如重新修訂對中國公平的條約。4. 曾紀澤的文章一出雖然引發不少西方公共輿論注意；但根據李思涵的研究，正面評價者並不多，大多認為曾紀澤對於中國的復興情況過於樂觀。不過，曾紀澤並未對

轉變也是另一重點。而這些重要的連結，套用史學家柯文(Paul Cohen)的話語，正是我們解開「睡獅」符號淵源之謎的三把鑰匙(three keys)。⁴⁰

甲午戰爭無疑是近代東亞的重大歷史事件，它對於東亞世界日後發展的重大影響自是無庸置疑。但是，儘管當時日本國內的愛國熱情和反中情緒不斷升高，在開戰之前，日方並不為國際所看好，西方列強普遍認為清中國應會取得勝利。但是，隨著清軍在開戰後節節敗退，而日本軍頻傳捷報，尤其是日本海軍在戰爭前期的重大勝利，日本國內的輿論可謂排山倒海地大肆宣揚日本和中國的優劣差異，同時將日本視為文明世界的先鋒，負有教訓落後野蠻中國的天職。⁴¹在這樣的氛圍下，我們不難想像在甲午戰爭期間，日本的公共論述中有許多關於清中國的論述不僅充滿負面評論，同時充斥著高度情緒化的負面形容字眼。許多負面字眼如「豚尾軍」、「清豚」⁴²紛紛出現在公共論述中。而在過往以「象」或「眠象」為主來形容中國的法，也發生了改變。在一本 1894 年末出版的預言支那帝國將在 1941 年滅亡的預言小說中，即出現了以「病象」的字眼來形容垂死的老大支那帝國：「於是這個像隻生了重病的大象般早已病入膏肓的古老大國，其版圖一年比一年減少，雖

外界評論有所回應，包含批評他最嚴厲的何啟和胡禮垣。曾紀澤的文章的中英文版和李恩涵的評論，參見曾紀澤，〈中國先睡後醒論〉，收入龍應台、朱維錚編注，《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頁89-96；Tseng, “China, the Sleep and Awakening,” 附錄於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頁149-161；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頁271-284。

⁴⁰ 當然，Cohen主要是指歷史有三種面向（三種調性）：事件、經歷和神話，每一種又有其特別的認知理解方式。我在此處的法只是單純借用字面上的意義，而非法學意義上的借鏡。見其詳細討論於Paul A.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xi-xv.

⁴¹ 有關甲午戰爭時期，日本方面如何重新定位日本和中國關係的種種公共論述之分析，參見Donald Keene,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and Its Cultural Effects in Japan,” in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Japanese Culture*, eds. Donald H. Shivel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121-175. 王美平，〈甲午戰爭前後日本對華觀的變遷——以報刊輿論為中心〉，《歷史研究》，第1期（北京，2012.02），頁143-161。

⁴² 桂枝雀，《日清事件大當新歌大全》（大阪：名倉昭文館，1894），頁64、66。

然為了保持住這個早已看不到未來的老軀，努力苟延殘喘著。」⁴³

然而，不同於上述這些負面的形容詞，何以在現代長期以來被中國本身許多論述也樂於引用的「睡獅」符號，居然會是最早出現於這些甲午戰爭時期對中國不友善的日本論述呢？簡言之，何以一個看似相當正面的「睡獅」符號，會被不懷好意的日本論述所創出和運用呢？要回答此問題，我們必須注意到和「睡獅」出現的歷史脈絡和文本脈絡兩個息息相關的面向。首先，是歷史時機的問題，無疑地，這一場影響巨大的戰爭成為重要的推力，激發了許多公共論述大量湧現，企圖為這場戰爭的意義定位詮釋，也因此催生了「睡獅」於此歷史時程。其次，我們必須仔細地檢視，「睡獅」在這些公共論述中描述詮釋甲午戰爭的敘事(narrative)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或者更精確來說，上述這些在甲午戰爭時期的公共論述，在他們企圖成為 Foucault 所謂的具有“regime of truth”(真理政權)地位的霸權論述時，他們為「睡獅」安排了什麼樣的論述角色，從而使得「睡獅」的出現，具有鞏固強化他們“rising/civilized Japan vs. decaying/barbarian China”的根本論調呢？

以下，我們將會一一檢視，在這種極力要宣揚文明日本和落後野蠻中國的存在著強烈對比，同時也經常抱怨西方列強在戰前錯估形勢，無視日本努力超越中國的輿論氣氛下，具有明確「睡獅」誕生蹤影的文本論述：在甲午戰爭之前後，分別有不同樣貌的「獅子」，被援引來形容中國(如福澤諭吉的缺爪牙的獅子、柴四朗的病獅，以及在甲午戰後島田三郎筆下的死獅)。也正是在甲午戰爭期間，我們發現了「睡獅」誕生於日本公共論述，成為明治日本以獅喻中國的一個新成員。以下我將一一介紹分析我所發現的四件提到「睡獅」的文本。

⁴³ 三文字屋金平，《支那帝國之末路》(東京：右文社，1894)，頁8。原文為：「斯くて此病める象の如き廢疾不具の老大國は、年一年と次第に其地域えお窄められをがらも、猶ほ且つ余命喘々として暫く絶望の老軀を保ちつづけつたりしが。」

(一)〈清國の真相〉

若是以人口來討論的話，中國所擁有的的人口數占了全世界總人口數的四分之一以上，因此西方人才會認為中國就像頭睡獅，如果一覺醒來必定吞龍吃虎，因此當甲午戰爭爆發時那些自稱知曉雙方國情的西洋人，多被這樣的妄想給迷惑，皆斷言最後取得勝利的必定是清帝國。⁴⁴上述的行文出現在 1894 年 11 月 7 日的《日本》新聞頭版〈清國の真相〉論說中。這應是目前為止，在全世界中外文學界有關「睡獅」比喻中國的淵源研究中，所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明確文獻證據。有趣的是，在此處的行文中，作者是主張此種比喻是出於西方人之口，和 1898 年大澤龍在文中所提到他人的說法「往年曾紀澤嘗論支那比之於眠獅」並不相同。但是無論是出於誰人之口，兩者在運用「中國為睡獅」的行文，都是在強調西方人，尤其是那些自認為「東方通」者，普遍是如此地相信中國的潛在力量，也因此，在甲午戰爭之前對日本的國力作了不公平的誤判。

這篇論說刊行時，日本海軍已在初期的黃海海戰取得大勝，登陸作戰上也是步步進逼，兩個星期後的 11 月 21 日順利攻克旅順要塞。日本的公共論述在這一連串的戰爭捷報的洗禮下，已迫不及待地表達出對於西方列強先前對日本的蔑視態度的高度不滿。也因為如此，在此〈清國の真相〉論說中，「睡獅」作為一種具有潛在力量的比喻符號，事實上是作者用來嘲諷無知的西方人所相信的假象；相形之下，日本人本身原有的認知(福澤諭吉的缺爪牙的獅子、柴四朗的病獅)才是真正洞悉中國實情的真知卓見。從以下的例證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其他運用「睡獅」符號的政論文章，也幾乎都是出自於這樣的用意。⁴⁵

⁴⁴ 一笑子，〈清國の真相〉，《日本》(東京)，1894年11月7日，頁1。原文為：「人口を論ずれば一國にして世界の人口四分の一以上を有するもの唯た支那あるのみ、西人故に曰く支那は眠れる獅子の如し一覺すれば必ず龍を呑み虎を食はんと、日清構難の始めに当たりて両国の事情に通曉すと自称する西洋人と雖ども多くは此等の妄想に眩惑し最後の戦捷は必ず支那帝国に帰すべきを断言したり。」

⁴⁵ 值得注意的是，刊行本文的《日本》新聞乃是明治時期著名的國粹派的機關報。本文關於中國和歐洲的批判觀點，可謂反映了國粹派當時的主張，尤其是陸羯南(《日

值得注意的是，〈清國の真相〉的開頭，居然提到了拿破崙：

歐洲人對於清國的觀察有點特別，至少其名過其實的點，與我們所觀察到的部分大相逕庭，就連世界唯一的大豪傑拿破崙一世，以他的銳眼也還無法觀察到清國的國運如何，他認為清國只需要靠著其航海技術便可以征服世界，這種以政治家的眼光，對清國發出讚嘆聲的風潮便是源自於這位豪傑，然而拿破崙針對主要的點進行的觀察其實是有所錯誤的。⁴⁶

作者認為拿破崙曾經認為中國靠航海技術就能稱霸世界的想法是錯的，因為中國的航海技術因長期保守心態根本早已落伍，而且即使甲午戰敗後，依然無心真正改革，作者因而總結：「普法戰爭後法國人無時無刻的深記著此仇，但清國卻不然，他們就像隻狗一樣，專門欺善怕惡，這是有歷史作為佐證，並非吾輩的妄語，顯然歐洲的觀察者們似乎並未理解這樣的事實。」⁴⁷

很顯然地，作者此處引用拿破崙的目的乃是要凸顯歐洲人連拿破崙之流者都不解中國實情，因而作出許多謬誤的判斷和預測。⁴⁸但是不經意的讀者，

本》新聞的主要創辦人)的日本對外政策想法。陸羯南一方面批判西方帝國主義擴張，另一方面則視日本本身對中國和朝鮮的擴張乃是日本晉身強國之林和文明國家的必經之道。有關陸羯南此方面思想的詳細分析見王俊英，《日本明治中期的國粹主義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頁186-195。

⁴⁶ 一笑子，〈清國の真相〉，頁1。原文為：「泰西人の清國觀察は稍々特別なるものあり、少くも其買被るの點に於ては吾人の觀察と其趣を異にする所あるが如し、世界唯一の大豪傑拿破崙一世の銳眼を以つて尚ほ且つ清國の國運如何を達觀する能はず、清國が世界征服する為めに要する所のものは唯々の航海術あるに過ぎずと論じたることあり、政治家の眼光を以て清國の為めに賞賛の聲を發したるは實に此豪傑に始まる、然れども拿破崙は主要の點に於て其觀察を誤れり。」

⁴⁷ 一笑子，〈清國の真相〉，頁1。原文為：「清國に至りては然らず、彼れ尚ほ犬の如し、怯者に向つては牙を顯はして吼へ、勇者に向つては尾を振りて媚ぶ、是れ已に歴史の証する所にして敢て吾人の妄語にあらじ、泰西の觀察者は未だ此事實を解せざるに似たり。」

⁴⁸ 在文末的結論中，作者即再次抱怨大多數西方人對於甲午戰爭結果的不公平誤測：雖然偶有一些西方人預測日本的完全勝利，但大多數人都認為那些預測是荒誕無稽的。從這裡我們可以理解西方人的偏見。日本在平壤九連城的會戰、豐島黃海海戰戰捷時，他們都認為，這僅僅是小小的一部分，並不是整體的勝利。偏見很難消除，就導致像這樣奇怪的結果。原文為：「偶然日本の全勝を予言したものがいるものの、その多くは大胆無謀の妄言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ていた。西洋人の偏見はま

不無可能或誤以為作者聲稱拿破崙曾認為中國就像頭睡獅，或者留下這樣的閱讀印象。以此觀之，本文〈清國の真相〉是否可能是長期以來流行的拿破崙中國睡獅說的來源呢(經過誤讀的結果)? 這個可能性值得玩味。⁴⁹

(二)《對清對歐策》

自古以來歐洲對於中國及中國人的觀察多半是言過其實，他們往往將其評價為「睡獅」或是「睡著的鯨魚」，而在這事情的背面，多多少少是將中國比喻成為垂死掙扎的鯨魚。從日清成敗來看這已經很明顯了，另外還有一點是無法接受的，就是截至今日我們對於中國採取的是非常寬仁大度的交際手段，因此當中國對於我們非常無理的時候，我們多半會將其忍下，這並非沒有任何原因，主要是因為邦人對於中國仍然有著過實的評價。……雖然說我們日本人對於中國人那言過其實的評價似乎沒有辦法停止，但歐美人似乎也是沒有認清事實，同樣深陷於此誤解之中。嗚呼，要察覺到一國的真實情況及正中紅心確實並不容易。⁵⁰

以上的陳述是出自渡邊修二郎在 1894 年底出版的專書中，他關於歐美

た察するべきである。平壤九連城の戦い、豊島黄海の海戦、日本軍が連勝するといえどもこれは一部の勝利にすぎず、全体の勝利ではないと考えていたものが多い。偏見は排除し難く、このようなものだ。」

⁴⁹ 這種閱讀上的誤讀可能性有一個最佳例證：梁啟超即曾以張冠李戴的方式，認為英國 Worsley 將軍曾以 Frankenstein 比喻中國。可是梁啟超這樣的認知即是源自他將同一篇文章中的不相干訊息連結起來的誤讀。詳細分析參見楊瑞松，〈從「眠獅」到「睡獅」：梁啟超睡獅說淵源新論〉，頁 254-255，註 13。

⁵⁰ 渡邊修二郎，《對清對歐策》(靜岡：奉公會，1894)，頁 38-39。原文為：「從來歐人ノ支那國及ビ其人民ヲ觀察スルヤ甚ダ其實ヲ得ザルモノアリ、往々支那ヲ以テ『睡レル獅子』或ハ『睡レル鯨』ニ此セリ、何ツ其事情ニ暗キヤ、余ハ支那ヲ以テ重傷ヲ負ヘル大鯨ニ比セツト欲スルナリ。日清成敗ノ數既ニ明ニシテ、復一点ノ疑ヲ容レザルニ、今日マデ我ハ支那ニ對シテ非常ニ寬仁大度ノ交際ヲ為シ、彼ハ常ニ無礼ヲ我ニ加フルモ、我常ニ之ヲ忍ビタルモノハ、其因由スル所ナクンバアラザルナリ、何ゾヤ邦人ガ支那ニ過實ノ価値ヲ置キタル……。然リト雖モ支那人買ヒ被リハ邦人ノミノ誤見ニ止マラズ、歐米人モ等シク一否ナ一層甚シク一此誤見ニ罹リシナリ、嗚呼一國ノ真況ヲ察シテ其正鵠ヲ誤ヲザ亦難カラズヤ。」

人及日本人對於中國認知上謬誤的批評言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渡邊修二郎並非等閒之輩，他不僅精通外文、著作等身，當時已有多部著作問世，例如《明治開化史》(1881)、《日本外交史末》(1880)和《世界ニ於ケル日本人》(1893)。⁵¹當然，對本研究而言，上述引文其中最有意義的莫過於這句話：「他們(歐洲人)往往將其(中國)評價為『睡獅』或是『睡著的鯨魚』。」但是他接下來的評論顯然認為歐美人和日本人事實上都沒有真正瞭解中國的虛實。有趣的是，他也如同前述〈清國の真相〉的作者觀點一樣，認為形容中國為睡獅的說法是出自於西方人之點，但是這一點是目前為止，所有關於睡獅的研究都無法確認的說法；反而是他所另外提到的(睡)鯨魚的說法倒是有所本而且可考。⁵²這樣的說法即出現他自己在下文中另外引述的外國人論述中。渡邊為了強化他自己的論點的正確性，引述和翻譯了一大段一位他認為少數有洞見的歐美「東方通」學者 Henry Norman 的評論(歐洲人能夠觀察中國情況者中，其論點比較能夠正中紅心的是曾來東洋諸國遊歷的 Henry Norman，其論點中有不少是值得討論的，因此於左邊進行引用)如下：⁵³

有一英國人應是現今之中最能知曉中國氣質的人，五年前他曾經跟我如此說道：中國特別為了其藩屬中的西藏及朝鮮發動戰爭，但就我(Norman)的觀察，除非北京會被波及，否則他們絕對不會公然與歐洲各國為敵。中國得到睡鯨的評價是非常合適的，因為中國知道它如果稍微動身一下，過往他所得到的威嚴都會因此消失，最終他就不能繼續安然地沉睡。這是中國為了讓自己能夠安睡而作出想要攪亂世界的假

⁵¹ 渡邊氏(1855-?)雖然沒有顯赫學歷，但精通外文並曾任日本各地的英語教師和低階地方行政官員，他關注日本史和日本對外交流史，有不少相關著作和譯作。關於其生平著述簡介，詳久野淳一，〈渡邊修二郎と横濱〉，《横濱開港資料館紀要》，第33期(横濱，2015.03)，頁1-5。

⁵² 此處鯨魚是對應英文的leviathan。在十九世紀西方文獻的確有以此字形容中國，例如刊行於1864年6月26日的評論文“The Future of China”，即是以“the great leviathan”形容中國。

⁵³ 渡邊修二郎，《對清對歐策》，頁41-42。原文為：「歐人中能ク支那ノ狀況ヲ視察シタル者ハ其論稍々正鵠ヲ得タルモノアリ、曾テ東洋諸國ヲ歴觀シタル「ヘンリー・ノーマン」ノ如キ是ナリ、其論頗ル觀ルベキモノアリ、因テ今之ヲ左ニ抄録ス。」

象。仔細地說，中國人一面信奉著孔子的野蠻主義，貪享其安逸；另一方面以「即將要睡醒的中國」為題發表虛張聲勢的文書，此書即是之前曾紀澤侯在雜誌上所刊登的那篇文章，一閱之後確實會對於中國產生戒心，且會記得其不屈的精神，將其視為會為了今日的進步而努力著。⁵⁴

⁵⁴ 渡邊修二郎，《對清對歐策》，頁42-43。原文為：「一英人アリ、現今生活スル諸人中二最モ能ク支那人ノ氣質ヲ知レル者ガ五年前ニ當リ、余ニ語りテ曰ク、支那ハ其屬邦中西藏及ビ朝鮮ノタメニハ敢テ其戰爭ヲ辞セザルベシト、然レド余ノ觀察スルコロニト據レバ、假令如何ナル事情ノ起ルルアルモ、支那ハ其帝都北京ヲ衝カルルノ日ニ及バズンバ、到底歐羅巴諸國ニ對シテ戰爭ヲ公布スベキ國ニアラズ、鯨ノ眠レル狀況ハ能ク支那ニ譬フルルヲ得ベシ、而シテ一朝躍動ヲ試ムルアラバ從來他ヨリ受ケタル威嚴ハ之ガタメニ消失シ、終ニ安眠ヲ貪ルル能ハザルニ至ルハ、夙ニ支那ノ了知スル所ナルガ故ニ、支那ノ好ム所ハ世界ヲメ支那一度崛起セバ如何ナル事件ヲ惹起スルヤモ知ルベカラザルルヲ想像セシムル傍ニ於テ其安眠ヲ為ス在リ、詳言セバ支那人ハ一面ニ孔子ノ野蠻主義ヲ奉ジテ其安ヲ貪リ、他ノ一面ニハ『眠リテ覺メントスル支那』ト題スル反古様ノ書ヲ著シテ其虛聲ヲ張レリ、此篇ハ故曾紀澤侯ガ數年前『エーシアチック・クォーターリー』雜誌ニ載セテ世ニ公ニシタルモノナルガ、試ニ之ヲ一閱セバ、支那ハ警戒心ニ富ミ、且ッ不屈ノ精神ヲ以テ今其進歩ヲ為スモノナリト記セリ。」

此段英文原文為：“Five years ago the Englishman who knows more of that inscrutable entity, the Chinese mind, than any man living, told that of all her ‘vassals,’ there were only two for which China would fight—Thibet and Korea. Personally, I do not believe that anything which could happen, short of an advance upon Peking itself, would cause China to declare war against any European Power. The role of sleeping leviathan suited her perfectly, but she has well known that the first step she might take would destroy the illusion upon which her security has been based. What she has liked is to remain perfectly quiescent, while the world trembled to think what she might do if aroused—to lie still in her Confucian savagery, while such utterances as that mass of rubbish called “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 which the Marquis Tseng signed (but did not write) in the *Asiatic Quarterly* for January, 1887, have represented her as advancing with a cautious but irresistible march. The strangest thing is that the civilised world has been deceived by these tactics, and even such keen analysts of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s the late Mr. Charles Pearson have painted a future in which China, having prepared herself by long training, should put forth her gigantic strength and over run the world.” Henry Norman, *The Peoples and Politics of the Far East: Travels and Studies in the British, French, Spanish and Portuguese Colonies, Siberia, China, Japan, Korea, Siam and Malaya*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95), 262-263. 必須指出的是，本書的出版年是1895年，而Norman在此書的前言中(viii-ix)，言明此書的若干內容曾在之前發表於報章雜誌上(但是他並未清楚註明是那些部分和報章雜誌出處)。有鑑於渡邊修二郎以及以下註

因為渡邊是引用 Norman 的文章來強化他本身的論述，Norman 對睡鯨的諸多批判自然也可視為是渡邊所贊同的論點。⁵⁵我們可以看到此處 Norman 大肆批判中國作為睡鯨的本質根本就是保守反動。Norman 更特別點名，在中國此種本質的框架下，曾紀澤的「先睡後醒論」根本是一種虛張聲勢的計謀，企圖以此假象嚇唬西方列強，以便中國能夠持續酣睡。但可悲的是西方人居然還都被此計謀所欺瞞。

渡邊此書的主要目的，是要說明甲午戰爭進行的結果已經揭穿中國虛張聲勢的計謀，而接下來日本要如何制定它的對歐和對清政策。但是他在本書中除了提到了「睡獅」和「睡鯨」的符號，並且借由 Norman 對於「睡鯨」的種種批判，表達出當時日本社會在沈醉於勝戰的氛圍下，將曾紀澤在 1887 年所撰寫的文章〈中國先睡後醒論〉斥之為中國的虛張聲勢的「大外宣」技倆。事實上在甲午戰爭期間，針對曾紀澤的文章論點作出反駁的文章不在少數，尾崎行雄即在其著名〈支那處分案〉中，斥責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乃是狂妄的「大話」，竹越與三郎則是雖然承認中國具有大象般的巨大潛力，但是現實中的清國並未如曾紀澤所宣稱的已為覺醒狀態。⁵⁶

就傳播效果而言，渡邊的文章卻是有將「睡獅」和曾紀澤連結的可能效果。他的文章中宣稱以「睡獅」和「睡鯨」比喻中國均是源自於西方人之口，

55 的 Davidson 教授，均是在 1894 年底引用 Norman 關於中國的評論，因此他們引用的文獻來源應是來自 Norman 先前所發表於報章雜誌文章而非本書。但根據 1894 年日文的譯文和 1895 年的書中原文仔細比對，可知 Norman 1895 年出版的專書的相關內容和先前發表於報章雜誌的觀點和行文是一樣的。

⁵⁵ Henry Norman (1858-1939) 為英國人，獲哈佛大學碩士學位後，成為傑出的記者。他在 1892 年到 1899 年間服務於 *Daily Chronicle* 期間，曾多次前往東方旅行探訪，並完成多部關於東方事務的報導和著作。他在 1900 年後從政並於 1906 受封為爵士，1915 年成為男爵。關於其生平見，「Norman, Henry (first baronet) 1858-1939」，<https://collection.sciencemuseumgroup.org.uk/people/ap24859/norman-first-baronet>，擷取日期：2021 年 9 月 20 日。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上述著作中關於中國的批評也大幅地被一位加州州立大學的 Davidson 教授的 1894 年 10 月發表之演講文稿所引用，包含文中以睡鯨 (leviathan) 喻中國的說法。該演說文原載於美國 *New Californian* 雜誌，被譯為日文後，以〈支那と日本〉為標題，收錄於大原嘉吉譯述，《日清戰爭歐米評論》(大阪：林莊太郎，1894)，頁 165-171。

⁵⁶ 進一步的分析參見楊瑞松，〈從「眠獅」到「睡鯨」：梁啟超睡獅說淵源新論〉，頁 260-263。

但是並未明白說明是出自何人之口。雖然從文章的後續的行文中，讀者可以讀到 Norman 這位西方人的確提到了「睡鯨」，可是「睡獅」則無明確的來源。在批判「睡鯨」的行文中，則又很明確地提到了曾紀澤和其文章。如此一來，又將曾紀澤的「先睡後醒之論」和這些「睡著的動物」符號糾結在一起。因此日後將曾紀澤和睡獅連結的論述，是否出於這樣的誤讀或許也不無可能。

(三)〈清國鐵道〉

有人說中國就如同睡獅，但如果這是真實的話，睡著的東西遲早會警醒的，不是嗎？⁵⁷

上述引文是一篇評論文〈清國鐵道〉的開場白，作者不詳。該文原先發表於《扶桑》新聞，隨後收入於 1895 年 2 月出版的《時事問題輿論演說》。這本書收集了甲午戰爭期間海內外輿論對於中日兩國力和國際局勢的各種評論。雖然以「睡獅」比喻中國作為開場白，但是〈清國鐵道〉這篇文章的主文，並沒有再對「睡獅」這個符號有進一步的論述。文章的前半段主要批評中國的保守心態並無自主意願從事現代化改革；後半段則以清國鐵路建設的落後情況說明上述保守心態。⁵⁸

然而在仔細解讀這篇文章時，我們赫然發現其中的內容，除了表述的語法略有出入外，實際上和下面將要引介分析的另一篇文章的其中段落的論點、內容和論述行文幾乎一模一樣。由於另一篇文章乃是一篇內容更長的外文的翻譯文，因此我們幾乎可以斷定此篇〈清國鐵道〉乃是一篇縮減的節譯文。其源頭也正是以下將要介紹分析的文章。⁵⁹但不論如何，儘管如果依據

⁵⁷ 〈清國鐵道〉，收入三好守雄編，《日清事件時事問題輿論演說》（東京：學友館，1895），頁44。原文為：「支那は眠れる獅子の如しと云ふたとへがあるが、これは果たして真であるのが、睡れるものなら早晚警醒ないとありませうの。」

⁵⁸ 〈清國鐵道〉，頁44-47。

⁵⁹ 經過進一步的文獻查證，此篇文章的原出處乃是明治27年(1894年)12月16日的《扶桑新聞》的同標題之頭版評論文章。但是《扶桑新聞》評論文在開頭多了一小段署名「扶桑評論子」的說明文，在其中扶桑子強調亞洲大陸鐵路建設對東洋經濟發

當代學術倫理的標準，這篇轉載文章恐怕有嚴重抄襲之嫌，它從報刊文章再被收入為專書文章的轉載過程，卻無疑大大加深其傳播影響力。當然，其開場白中所出現的睡獅中國之喻，也隨之而有更廣泛的流通性。

(四) 〈清國の攪眠如何〉

清國如同睡獅，當真是如此嗎？入睡者早晚必然會驚醒，而這就是問題之所在。還記得七年前的事情，當時時任駐英清國公使曾紀澤侯曾在《亞細亞季報》(1887年1月刊行)發表了一篇關於清國將從漫漫長夜中醒來，在歐洲文明戲劇中占有一席之地之文章，這篇論文至少會讓東方和西方的讀者同時感到驚訝。因為曾侯的這篇文章會讓只深信自己國家，然後宛如井底之蛙，對於他國事務根本不清楚的歐洲讀者感到驚訝，因為這種讀者或許平生僅將人類社會分作文明及野蠻兩種，他們深信著接受文明社會的指導，以及拜服在文明社會的跟前，對於野蠻社會來說不僅是義務更是天命。在他們眼中，中國就是個野蠻的首領，即為文明的公敵，而最終它是否真的會力有未逮地屈服於文明之下？亦或是中華人民是否真的會臣服於歐洲人的腳下？若真如此，那對於世界來說，會是一大祥瑞之事，就由我來稍微探究此種說法的真相。⁶⁰

展非常重要，因而摘要カルゾン氏《極東問題》一書中關於清國鐵路建設的討論(實際上乃是節錄下文將提及的刊載於1894年12月10日之《日本新聞》的〈清國の攪眠如何〉翻譯文章內容)以饜讀者。但有趣的是，其正文開場白也是和〈清國の攪眠如何〉一樣，同樣是「清國如同睡獅」之主題陳述(但收錄於《時事問題輿論演說》專書的同標題文章的睡獅主題開場白，則是改以「支那」二字取代「清國」)。此外，《扶桑新聞》評論文其他關於清國鐵道之行文措詞也和〈清國の攪眠如何〉中的相關內容幾乎是一模一樣，因而可斷定1894年12月16日的《扶桑新聞》評論文〈清國鐵道〉乃是抄自1894年12月10日之《日本新聞》的〈清國の攪眠如何〉部分文章內容，之後再經若干文字措詞變動後，再以同標題文章(〈清國鐵道〉)的樣貌收錄於1895年2月出版的《時事問題輿論演說》之專書。究其根本，三篇文章中關於清國鐵道的敘述分析均是來自カルゾン氏《極東問題》；不過，三篇文章有關睡獅主題的開場白，其實並未出現在カルゾン氏《極東問題》一書中。下文將會詳細分析此重要差異點。

⁶⁰ 〈清國の攪眠如何〉，《日本》(東京)，1894年12月10日，頁4。原文為：「清國は

這篇刊載於 1894 年 12 月 10 日《日本》新聞的〈清國の攪眠如何〉文章並未載明作者，但在標題旁有括號註明：「カルゾン氏『極東問題』中の一節」，由此觀之，這是一篇譯自外文著作的譯文。初看此篇文章，不免令人感到欣喜若狂、雀躍萬分，因為從字面的資料看來，加上文章開頭的第一句話：「清國如同睡獅，當真是如此嗎？」，這些因素加起來，不正是指明這位カルゾン氏洋人，正是長久以來所謂「西方人稱中國為睡獅」說法的一項再也明確不過的證據嗎？只是，當我們花了一番檢索判讀的工夫，找到了這一位日譯名カルゾンの原作者 George N. Curzon 和其對應《極東問題》的英文著作 *Problems of the Far East* (1894) 後，在翻遍全書，尤其是日本譯文所對應的第十章“The So-called Awakening of China”後，根本找不到「清國如同睡獅，當真是如此嗎？」這句話的對應原文，更遑論任何「睡獅」的對應字眼。事實上，英文第十章的一開頭即是在講述七年前曾紀澤發表〈中國先睡後醒論〉的所引起之回響的歷史經過(Seven Years ago,……)。⁶¹

睡れる獅子の如しと、是れ果して真なるか、睡れるものは早晚必ず驚起せざるべからず、問題は實に此点にあり、七年前の事と覚ゆ、時の駐英清國公使曾紀澤侯は《亞細亞季報》(千八百八十七年一月刊行)に於て清國か念念長夜の睡眠を破りて泰西文明の活劇場に躍出せんとするの事情を論じたり、該論文は少くも東西の読者を驚駭せしめたるに相違あらじ、曾侯の此論文を草したるは国より深く自ら信ずる所あるに由る井蛙の管見を守りて毫も自國以外の事情に通曉せざる歐洲の読者は必ず驚きを此論文に措きたることならん、蓋し此種の読者は平生唯だ人類社会を以て文明と野蛮との二種に區別し、文明の頤指を受けて文明の前に拜伏するは野蛮なるの義務否天命なりと信するのみ、彼等の眼中より見れば支那は野蛮の巨魁にして即ち文明の公敵なり、彼れ終に力敵せずして文明に屈從したるか、中華の人民は果して泰西人の脚下に臣従の禮を執りたるか、若し真に斯の如くならんには是れ實に世界の一大祥瑞なり、清か吾人をして少く此説の真否を究めしめよ。」

⁶¹ George N. Curzon (1859-1925) 出身於英國貴族家庭，在接受 Eton 和 Oxford 的菁英教育後，於 1886 年成為國會議員後即到世界各地遊歷，尤其對亞洲事務感到著迷，並發表了三部和亞洲相關的著作，其中包含了 *Problems of the Far East* (1894)。Curzon 日後在政治上平步青雲，成為史上最年輕的印度總督(1898-1905)，最後並擔任英國外相(1919-1924)。有關 Curzon 的政治生平，見 Lord Curzon，<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Lord-Curzon>，擷取日期：2021 年 9 月 20 日。Curzon 顯赫的家世背景和政治地位，使得他有關亞洲(東方)的論述具有不容小覷的影響力，正如同 Said 在 *Orientalism* 一書的第一章中，所引述分析的 Arthur James Balfour, Lord Cromer 對埃及的看法一樣，這些英國知識菁英和高官對於東方的論

從上述英日文文獻的交互比對，我們可以判讀出，日文譯文中的第一段話，也就包含睡獅的那一段話(清國如同睡獅，當真是如此嗎？入睡者早晚必然會驚醒，而這就是問題之所在。)並不是出自原作者 Curzon 的原著，而是由不具名的日本譯者自行添加上去的句子。⁶²有趣的是，幾乎和這句話雷同的句子，也出現在前述〈清國鐵道〉的開場白(有人說中國就如同睡獅，但如果這是真實的話，睡著的東西遲早會驚醒的不是嗎?)。由於〈清國鐵道〉的全部內容幾乎全部

述，和大英帝國的霸權擴張事業彼此之間，乃是具有知識和權力相輔相成的密切關係。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31-49.

⁶² 英文原文如下：“Seven years ago the Western, and I dare say the Eastern world also, in so far as it was made aware of the fact, was startled by the appearance in the pages of an English magazine of an article by the foremost Chinaman then living, a tried statesman and a successful ambassador, in which, with a skillfulness that was to be expected of his abilities, and with an emancipation of sentiment that was surprising in his nationality, he advanced the propositions that China had at length been aroused from her age-long sleep, and, with the same energy that she had for so many centuries pursued and idealised the immobile, was about to enter into the turbulent competition of modern progress. No doubt the Marquis Tseng sincerely believed in his own assurances; unquestionably they proved palatable to the large class of European readers who cannot conceive of any standard of life, either for an individual or a nation, except that which prevails in the country of which they themselves are citizens, who bisect mankind into two camps, the civilised and the barbarian, and hold it to be both the destiny and the duty of the latter to wear the former’s gyves. Had China, at last, the most arrogant of the rebels, the most formidable of the barbarians, been driven to capitulate? Was the Celestial about to sit a chastened convert at the feet of Western doctors? So blessed a proclamation had not for long been spread abroad upon the earth; and loud were the Hosannas that went up from chapel and conventicle, from platform and pulpit and press, at these glad tidings of great joy. It may be worth our while, who are neither, like the Marquis Tseng, diplomats whose interest it is to conciliate, nor prophets who are ahead of our times, to examine how far it is true that China has really awakened from her ancestral sleep, or whether she may not merely have risen to stop the rattling of a window-sash, or the creaking of a shutter, that interferes with her quietude, with the fixed intention of settling down once more to the enjoyment of an unabashed repose.” 事實上，在這一章“THE SO-CALLED AWAKENING OF CHINA”的開頭，Curzon的原著有一段拉丁詩文的卷頭語，出自古代羅馬詩人Marcus Manilius (Idem semper erit, quoniam semper fuit idem. Non alium videre patres aliumve nepotes. Aspicient. Deus est qui non mutatur in aevo. MANILIUS, *Astronomica*. I. 528-530.)，其大意为事物恒長不變，應是用來影射中國的情境，但是這和日文版的「睡獅論」開場白文句完全不同。George N. Curzon, *Problems of the Far East: Japan-Korea-China*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4), 336-337.

抄自〈清國の攪眠如何〉，很顯然地，它的開場白也是在稍作調整下，源自於〈清國の攪眠如何〉，只不過這句話並非來自原作者 Curzon，而是來自不具名的日本譯者。

〈清國鐵道〉在抄襲模仿〈清國の攪眠如何〉開場白之後，並未抄錄後者有提到曾紀澤的第一段論述，而是直接抄錄 Curzon 第二段開始的論述。Curzon 認為中國改革的真正問題「並非是因為真心打破自我的執念，進而學習他人的長處來改進自己的短處，而是因為對於外國的威脅感到恐懼而已。電信及鐵道的輸入，建造船堅炮利，以及其他工廠引進外國的機器開始機械化，設立報章雜誌、經營著許多工廠等皆是如此，乍看之下好像早已是全面西化，但從中國心中的算計來看的話，這並非是對於西洋的文明感到羨慕，而是因為如果不這麼做的話，國家的維持勢必會陷入危機」。⁶³Curzon 之後特別舉中國鐵路建設半步化的進展為例證，從論斷中國並不可能真正覺醒。

很明顯地，Curzon 著作，特別是他關於所謂「中國先睡後醒」的批判，無疑和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公共輿論的口味相符。他以曾紀澤的言論為標靶，揭發中國根本不是如同曾紀澤所宣稱的崛起中，甚或是已覺醒的潛在力量的嚴厲批判，和當時日本的主流言論，一再強調日本的軍事勝利徹底戳破中國虛張聲勢的講法可謂不謀而合。令人感到好奇的是，何以日本的翻譯者還要加油添醋地自行加上那一段有關「睡獅」開場白呢？為什麼須要“put words into Curzon’s mouth”？

一個可能的答案，是那一位不具名的譯者也早就認定相信以「睡獅」喻中國的手法確是西方人常用的說法，因此即使原作者 Curzon 並未運用睡獅，但以「睡獅說」作為開場白，來點綴一篇來自西方談論中國是否覺醒的文章的作法，或許既可有破題效果又可以吸引讀者眼光。

⁶³ 〈清國の攪眠如何〉，頁4。原文為：「是れが決して真實自個の頑迷心を碎きて短を棄て長を取るの意に出でたるにあらず、販する所は單に外國の威赫を懼るるにあり、電信鐵道を輸入し、造兵造艦及其他の工場に外國の機械術を使用し、新聞を起し利源を聞き、工業を營みたるが如き一見恰の改化したるの觀ありと雖も、その深意を忖度すれば必ずしも歐洲の文明を羨慕するが為めにあらず、唯だ斯くせざれば其國を維持するに不都合なりと感じたるに由るのみ。」

但是從客觀閱讀效果而言，任何閱讀此文章的讀者最可能得到的印象，即是因而確信西洋人的確有以睡獅喻中國的講法，而這篇文章のカルゾン氏(Curzon)即是一個明確的代表。也因為如此，非常諷刺地，在我們先前引用到的〈清國の真相〉和《對清對歐策》の文中，都有提到過的西方人以睡獅喻中國的空泛講法，反而因為這一條事實是造假(在有關睡獅部分)の文獻而顯得所言不假。也因為如此，對於任何曾經閱讀過〈清國の攪眠如何〉の日本讀者，所謂「以睡獅喻中國之說」是來自西方の認知，必定在他的腦海當中流下深刻印象。

至於對那些可能沒有注意到這是一篇外文著作の譯文の讀者而言，另一個可能產生的深刻印象，則是將睡獅說和曾紀澤緊密地連結起來。因為在〈清國の攪眠如何〉第一段の行文中，在睡獅の開場白之後，馬上接著就談論到曾紀澤の「中國先睡後醒說」分析討論。對於任何沒有直接仔細讀過曾紀澤文章の讀者而言，這樣的閱讀印象和連結是在相當程度上可以想見會發生的「誤讀」後果。大澤龍 1898 年の〈支那論〉中，所提到有人說「往年曾紀澤嘗論支那比之於眠獅」之傳言，就不無可能是上述「誤讀」和傳播の產物。

從以上の日文文獻證據顯示，在所有中外文の文獻中，我們目前可以明確地找到的最早以「睡獅」喻中國の文本乃是出現在明治日本甲午戰爭時期(睡れる獅子)。但弔詭的是，在這些日本の文本敘述中，至少有兩條資料均宣稱這樣的比喻手法是出自西方人口中。此外，在以上四條文獻證據中，有兩條在提到睡獅的同時，也提到了曾紀澤の中國先睡後醒論，而在之後大澤龍的文章中，以睡獅喻中國人の說法變成是源自曾紀澤，而非西方人。當然，曾紀澤の文獻資料很清楚地顯示，他從未曾以「睡獅」喻中國，即使是在他最相關的「中國先睡會醒論」文章中，也不存在所謂「睡獅」の比喻。我們因此可以斷定說，所謂「往年曾紀澤嘗論支那比之於眠獅」之傳言，乃是日本の公共輿論界“put words in Tseng’s mouth”的結果。同樣的道理，在目前沒有任何英文文獻證據可以佐證之下，所謂西方人以睡獅比喻中國の說法，是否也可以合理地懷疑同樣是日本公共輿論界所創造想像の產物呢？⁶⁴以上疑

⁶⁴ 當然，要確認「往年曾紀澤嘗論支那比之於眠獅」(或者拿破崙之中國睡獅說)之傳言

間或許有待後續的研究進一步地探究，才能有較清楚的答案。但是，我們不妨換一種角度，思索何以在甲午戰爭時期，「現蹤」於日本公共輿論界的「睡獅」，不乏以「出自外人之口」（不論是空泛所指的西方人/歐美人或是之後較明確的中國人曾紀澤）的方式來呈現呢？為何這些有關睡獅的論述，會強調「中國是睡獅」是西方人或中國人的說法，而非日本人的想法呢？在以下的結論中，我將會以這種「源自西方人/中國人口中的中國睡獅論」的論述功用(function)，進一步反思在明治日本出現的「睡獅」之歷史意義。

四、明治日本的「東方」：「睡獅」與日本的甲午戰爭記憶

明治日本在其以西方為師的「文明化」之過程中，一方面確立以當時西方列強作為文明的標竿進行各項政經軍事改革；另一方面，明治思想界也開展建構其本身「東方」論述想像，並從而定位明治日本在其中的位置。也因為如此，在明治日本的「東方建構想像工程」中，如何界定和論述「支那/清帝國」，從而彰顯日本的地位和價值，便成為其中重要的一項論述環節。簡言之，明治日本在其追求和西方並駕齊驅的過程中，也創造出了它所想要認知界定甚至主導宰制的「東方」，而此東方的一個核心對象正是「支那/清國」。特別是在甲午戰爭時期和之後，大量有關「支那/清國」的另類「東方主義式」公共論述紛紛出現。⁶⁵

為後人的創造想像並不難，因為仔細檢視曾紀澤(或拿破崙)留下的相關文獻即可有相當確定的答案。相對地，要證明「西方人曾以睡獅喻中國」的空泛說法並不是歷史事實，則是非常困難，因為這無異於是大海撈針，要證明一件極可能不存在的事實。石川禎浩對此種研究上的困境有以下生動的敘述：「在歷史上，要證明某一事項曾經『有過』並不難，而要證明其『沒有』卻是很難的。無論累積多少『沒有』的狀況證據，也不意味著可以證明『有過』的證據的沒有」。參見石川禎浩，〈「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告示牌問題考〉，收入黃克武主編，《第三屆漢學會議論文集：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142。

⁶⁵ 有關日本的東方主義論述的仔細分析，尤其是關於日本和中國的重新定位，見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ad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115-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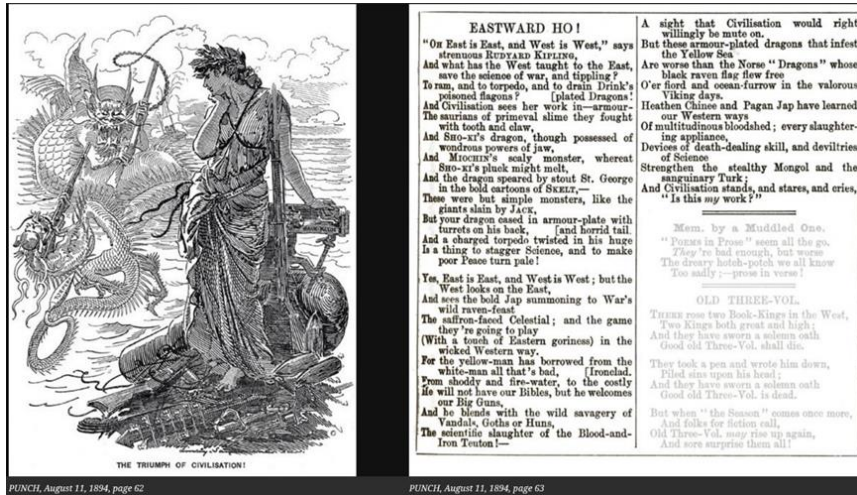
本文所探討的「睡獅」正是在這樣的大歷史脈絡中所誕生。在甲午戰爭時期紛紛出籠的各類政論，固然有很多是針對戰情進展的報導和評論，但有相當多的相關論述都不僅是停留在軍事議題的層面，而是將此戰爭的意義全面提升至中日兩國文化、政治、社會、經濟、制度乃至國民性等各方面優劣勝敗的重新定位。Elman 即以當時流行的戰爭木刻畫為例，分析當時日本的公共輿論如何形塑進步文明的日本打敗野蠻保守的中國的歷史形象。⁶⁶關於日清之間甲午之戰，盛行於當時日本知識界的一種看法，即是定位這場戰爭為代表文明的日本，來「教訓」代表野蠻落後的清帝國的「文明開化」之役。宣揚此看法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正是 1875 年時仍將支那和日本並列為半開國家的福澤諭吉。他在 1894 年 7 月間所發表的〈日清の戦争は文野の戦争なり〉(日清戦争は文野之戰)，即很明白地用此「文明 vs. 野蠻」的框架，定位此次戰役的歷史意義。其他如外相陸奧宗光(1844-1897)以及知識人內村鑑三(1861-1930)與植村正久(1858-1925)等人，也都紛紛依從此框架，大肆宣揚日本開戰的正當性甚至必要性。⁶⁷但是從甲午戰後三國強力干涉還遼的事件可以看出，西方列強對於日本這種自我膨脹為「文明國」的先鋒的想法並不認可，自然也並未將日本的勝利理解為文明戰勝野蠻的結果。1894 年英國 *Punch* 雜誌的一幅 “The Triumph of Civilization!” 插畫，以一大一小的龍(dragon)分別代表中、日兩國，揮舞著從西方文國學到的現代槍砲器彼此纏鬥的畫面，用以嘲諷這項結果即是西方文明對這些異教國家的最大貢獻(插畫旁的解說詩文，明確以異教徒 Heathen Chinese, Pagan Jap 分別指稱中國人和日本人)。⁶⁸(參見附圖 2)由此也可看出，日本的公共論述將日本自視為文明的一員，代表文明國

⁶⁶ Benjamin A. Elman, “The ‘Rise’ of Japan and the ‘Fall’ of China After 1895,” in *The Chinese Chameleon Revisited: From the Jesuits to Zhang Yimou*, ed. Zheng Yangwen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3), 143-171. 類似的論點可參見鍾淑惠，〈從圖像看日本對甲午戰爭的宣傳〉，《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3期(臺北，2015.05)，頁45-82。

⁶⁷ 關於此種「文野之戰」的論述模式分析，見松本三之介，《近代日本の中國認識：徳川期儒學から東亞協同體論まで》(東京：以文社，2011)，頁111-117。

⁶⁸ 見 *Punch* 雜誌圖文於 MIT Visualizing Cultures，
https://visualizingcultures.mit.edu/throwing_off_Asia_02/visnav_ii_ihtml，
擷取日期：2021年6月7日。

教訓野蠻中國的想法，實際是相當一廂情願的自我中心的誇大想法。



附圖2，“The Triumph of Civilization!”轉引自：MIT Visualizing Cultures

https://visualizingcultures.mit.edu/throwing_off_Asia_02/visnav_ii_ih.html。

然而，正是上述這種盛於甲午戰爭時期的以膨脹日本的國際地位和文明位階的另類「東方主義論述」，可以適切地解釋何以「睡獅」作為一種源自西方人口中或是中國人自誇的具有強大潛力的中國之比喻，會成為在此時期日本的公共論述所欲再現「represent」的中國形象。在這些熱切強調甲午戰爭證明日本乃是文明之先鋒，東亞之第一強國的論述中，往往展露出一種忿忿不平之氣，即是抱怨中國在戰前如何被西方列強所看好，日本急於效法西方加入文明之國的努力反而被輕視。正是在這種心態氛圍之下，我認為提供了「睡獅」以相當特殊的方式現身於甲午戰爭的明治日本輿論界。當「睡獅」作為一種具有潛力，養精蓄銳的強大力量的符號來比喻中國的說法，被當時的日本論述設定為是出自於(無知的)西方人或是(自大的)中國人之口的再現方式，它的論述效果無疑發揮了強化和對比出日本人對中國的實情之真知卓見。因為早在甲午戰爭之前，在日本人的論述中，以「獅」喻中國，若不是「缺爪牙的獅子」(福澤諭吉)，則是「病獅」(柴四朗)，甚至是甲午戰後，島田三郎筆下的「死獅」，都是一堆有問題的獅子。相對地，「睡獅」，尤其是依照曾紀澤所描繪出的中國乃是先睡後醒的雄姿所定義的「睡獅」，和上述

這些有問題的獅子形成強烈的對比。也正因為如此，會真的認為中國是「睡獅」的人，不正是只有那些無知被中國宣傳所欺騙的西方人，或是自我催眠的自大中國人嗎？如此這般的認知和論述情節安排，不正是最能烘托出日本在甲午戰爭一役中，為了戳破這個所謂廣為西方人相信或中國人自誇的「睡獅」假象，為文明世界教化野蠻落後中國的努力之偉大貢獻的日本的「東方主義」論述主旨嗎？

簡言之，誕生於甲午戰爭時期日本公共論述的「睡獅」，其功用並非是要真正肯定中國的潛力或實力，而是作為一種被日本所設定然後並且揭穿的「假象」的負面角色而存在；而曾紀澤則是被視為是這個陰謀假象的重大推手，他即使本身沒有說出「睡獅」二字，他的〈中國先睡後醒論〉也被設定為是「睡獅」符號的最佳註解。費約翰認為曾紀澤的真正用意是企圖以挪用當時在西方具有負面意涵的“sleep”，轉而以正面意涵詮釋中國的真正實力，進而要求西方列強正視中國的崛起。可是李恩涵的研究也指出，當時西方的輿論界對於曾的說法並未有太正面的回應，也不認清中國的實力足以挑戰西方列強並要求重新修訂條約。⁶⁹但是，在甲午戰爭的日本論述中，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的影響力往往被放大了。它成為中國欺瞞西方列強的主要利器，而西方人也大都因而受騙上當。簡言之，曾紀澤被賦予了一個新的角色：他所密切關連的中國「睡獅」意象，成為新興的日本在定位中國的真正面目的過程中，所揭穿(unmask)的中國假象，而甲午戰爭的一項重大意義，也正是由於日本的奮鬥犧牲，才得以為文明世界揭發這個中國的大騙局。

這一個出現於甲午戰爭時期日本公共輿論中，「以睡獅喻中國乃是出於外國人之口」認知想像，在歸諸於西方人的論述模式方面，是否有持續性的發展，仍有待更多的文獻檢索方能驗證。但是在歸諸於曾紀澤的論述模式上，卻的確是有若干顯著例子展示其後續發展。從以下這些例子也可清楚看出，「睡獅」和日本日後對甲午戰爭記憶的論述之間的密切關連性。

一篇名為〈清國外交の活歴史〉(1905)的評論文，在評論清國十九世紀晚

⁶⁹ John Fitzgerald, “‘Lands of the East Awake!’: Christian Motifs in Early Chinese Nationalism,” 361-410。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頁271-284。

期的外交政策本質時，以大段篇幅引介分析了曾紀澤的政策。文章指出，中國根本沒有追求真正自立自強之道，而是依靠外表虛張聲勢的所謂「子產外交術」來操弄列國，而列強竟也為其所欺騙，因而對中國有所忌憚。而曾紀澤所提出的清國乃是睡獅的說法，即是這種欺騙技倆。事實上，這篇文章有許多事實上的謬誤，包含認為曾紀澤以睡獅比喻中國，以及其典故乃是來自「臥龍」，還有何啟駁斥曾紀澤，認為清國應是死獅而非睡獅等等陳述。⁷⁰但是作者對於曾紀澤的相關說明，和上述甲午戰爭時期的論述將其視為陰謀家，企圖以中國先睡後醒之說欺瞞恫嚇列強的思維邏輯是一致的。這反映了上述以「睡獅」作為中國欺瞞列強的假象的看法之持續發展。

此外，著名的日本史學家稻葉君山，更在其名著《清朝全史》(1914)中，強化睡獅和曾紀澤，以及甲午戰爭之間的密切關聯性。在此著作中有一小段陳述分析甲午戰爭的意義，其標題即為「支那並非睡獅」(支那は眠れる獅子にあらず)。⁷¹稻葉指出在甲午戰爭之前，歐美各國都不清楚清國真正的實力，因而對中國有所忌憚。直到日本以小國之姿擊敗大國支那，才讓世人以及中國人自己覺醒到李鴻章先前在北方的國防建設都是非常浮誇、不切實。在此節的結論中，稻葉甚至非常不留情面地引用他也認為曾紀澤曾經講過的睡獅說，來抨擊中國和說明歐洲人對中國實情的恍然大悟的情形：「二十年前曾從公使曾紀澤那兒聽到『中國是睡獅』的歐洲人，現在則發現睡獅並非獅

⁷⁰ 〈清國外交の活歴史〉，《東京日日新聞》(東京)，1905年11月5日。原文為：「然れども當時清國自身は其國情國力を打算し自立自強の根本に遡らず、唯外觀を盛裝倨強して所謂子產的外交術に頼り、列國を操縦し而かも列強亦實に清廷の實力を蹴らず、觀望以て清國を憚りたるなり、清國近世の一大外交家として上下の尊崇盛名今尚赫々曾紀澤氏が、今より十數年前、清國を列強に紹介するに常り、彼の有名なる論策に曰く、清國は眠れる獅子なりと、即ち臥龍の二字より翻譯したる眠獅の二字を以て當時歐亞外交社會を風靡し、露國外務大臣ゴルチヤコン氏も之が為めにイリ條約に於て曾紀澤の要求を容る、に至れり、當時南清第一の洋學者たる何啟氏は曾紀澤の眠獅說を駁して清國は眠獅にあらず死獅なりと論難したる時、曾紀澤は答へて曰く、今や列強清國の内情を知らざる間は是れ實に清國は眠獅なりと言ひたる此主意を味へば、曾紀澤氏の如きも四千年來因襲性を為せる支那國民に向ひ自強自立の根本的策略を立て、列強に對する能はず。」

⁷¹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社，1914)，頁703。

子而只是一頭(家中畜養的)豬，因此不再有所忌憚。」⁷²

稻葉關於曾紀澤有關睡獅論的謬誤認知有些令人意外，因為作為一位著名的史學家，他應該可以查證曾紀澤是否曾經以睡獅喻中國。但是反過來思考，如果連稻葉這種地位的史學家都輕易地認為曾紀澤乃是「中國睡獅論」的始作俑者，那也正可反映出這樣的認知已有相當程度的流通性。再者，稻葉的上述結論更可以完美地解釋先前所謂「西方人認為中國為睡獅」的說法，因為歸根究柢，西方人也是從曾紀澤那兒聽說的，卻在不明究裏的情形下輕易採信曾紀澤的說法，直到甲午戰爭一役，因為日本揭發此假象後，才恍然大悟瞭解到中國的實情。

在運用「睡獅」論述甲午戰爭的人物，有一位不能略過的重量級人物，那就是鼎鼎大名的大隈重信。作為近代日本政治界和知識教育界的代表性人物，大隈重信對於中國的立場是相對地友善，基本上主張「支那保全論」，扶持中國。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大隈似乎相當喜好以「睡獅」符號來論中國局勢，而且也同樣宣稱曾紀澤以「睡獅」比喻中國。⁷³在他於 1914 年和 1915 年間的著作中，他多次提到了睡獅和曾紀澤。同樣地，他所勾勒的歷史場景，依然是依循上述的論述的模式，將睡獅的創生歸諸於甲午戰爭前的曾紀澤的論說，同時也強調當時西方人也對此說深信不疑(曾紀澤說中國是頭睡獅一事絕非大言不慚，而是他自己也是如此相信，更甚著或許連英、法、俄等國也是如此深信

⁷²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頁704。日文原文為：「二十年前公使曾紀澤によりて「支那は眠れる獅子」なりといふを聴取せる歐洲人はここに於て、眠れる獅子は獅子にあらずして、却て豚なりと公言して憚らざるに至りたり。」值得注意的是，在但燾所譯訂的《清朝全史》中文版中，這一段話的非常負面的語意被中文譯文淡化處理為「二十年前，曾紀澤曾對歐洲人曰『中國一睡獅也』。至此而歐洲人乃知睡獅之聲價也」。稻葉君山著作，但燾譯訂，《清朝全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2015)，第83章，頁27-28。

⁷³ 大隈重信最早使用「曾紀澤以睡獅比喻中國」的說法，應是他在1901年的演講〈清國問題〉，《東洋》，第二號(東京：經緯社，1901)，頁47-58。基本上，大隈對於曾紀澤的中國睡獅說，比較具有「同情的理解」，因為他認為當時清中國的國力的確因為自強運動而有所起色。但大隈也認為清中國也因此驕矜自大，瞧不起他國，尤其輕視日本，最終也因改革不力導致甲午之役一敗塗地，證明中國為睡獅之說仍是一項假象。我要特別感謝京都大學石川禎浩教授幫我找到此項史料。

不已)。⁷⁴他更生動地以英國為開戰前的日本憂心為例，凸顯當時歐洲人對東亞，尤其是中國實情的誤判(當時英國則認為日本是個弱國，當然從那個時候開始，日本似乎被認為是個在未來會變強的國家，但其強大遠遠不能與中國相提並論，因為對方是中國，更何況是頭睡獅，所以只要清醒後便會變得強大，就能夠施展王者的威風)。⁷⁵

大隈口中的曾紀澤並不是一位陰謀家，他也認為以當時曾紀澤所處的中國局勢，的確有令人稱道的改革之處，因此曾紀澤以睡獅比喻中國的確令西方人擔憂(當時中國也正好開始大量的採用西洋文明，學習富國強兵之術，那時候編制了新式陸海軍，特別是設置了大沽砲台及旅順、威海衛等軍港，在這一部分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若以這種態勢發展下去的話，未來中國將成為一個不容小覷的國家時，眠獅一詞則會成為列強民心中揮之不去的夢魘)。⁷⁶儘管大隈有上述這些可謂是對曾紀澤的中國睡獅之喻(大隈堅信睡獅出自曾紀澤之口)的同情的瞭解，他對甲午戰爭意義的「最後審判」，仍舊是將榮光歸給一直被列強所瞧不起的日本；至於中國則是因為此戰完全暴露其「睡獅」的假象，實質上是行將就木、四肢冰冷的老獅(其結果卻是讓中國的真相毫無懸念地攤在全世界的面前，當真相攤開後大家才知道這哪是什麼睡獅，根

⁷⁴ 大隈重信，《日支民族性論述(前篇)》(東京：公民同盟出版部，1915)，頁7。原文為：「曾紀澤が支那を眠れる獅子といつた事は決して一場の大言では無く、自らも左様に信じ、又動もすれば英、佛、露等の如きも左様に思ひ込んで居たかも知れぬ。」

⁷⁵ 大隈重信，《日支民族性論述(前篇)》，頁11。原文為：「當時英はまだ日本を微弱なりとのみ思つた居たのである。勿論其頃から日本は将来強くなり得る國と考へたらしいけれども到底支那とは比較の段でない、何としても支那である。況んや、眠れる獅子である。是が一び覺醒すれば強大となり、能く獸王の威を振うとのみ思つて居た。」

⁷⁶ 大隈重信，〈三たび東方の平和を論ず〉，收入早稻田大學編，《大隈重信演說談話集》(東京：岩波書店，2016)，頁307。原文為：「即ち支那はあたかも盛んに西洋文明を採用して富国強兵の術を勉めた頃で、洋式の陸海軍を編成し、特に大沽砲台、旅順、威海衛の軍港を設くる等、その面目を一新するの概あり。この勢いを以て進まば、支那の将来侮るべからざるものがあつた時とて、眠獅の一語は痛く列強の民心を刺激したものであつた。然るに日清役起るや勝敗の結果は如何であつたか。」

本是頭早已毫無鼻息、四肢僵硬的老獅)。⁷⁷

從以上我們對於甲午時期乃至於大隈等人的論述的引介分析，我們不難看出誕生於甲午戰爭時期日本公共論述的「睡獅」，事實上極可能是新興的日本為了美化日本軍事上的勝利具有重大文化意涵的論述產物。看似實力堅強，蓄勢待發的「睡獅」，就如同是中國自己披上或無知的西方所贈與的「國王的新衣」。所幸有日本，在飽受西方列強甚至中國的輕視之餘，敢於以小博大，才得以揭發這一個「世紀大騙局」，讓中國野蠻落後的本質再也無所遁形，同時彰顯了日本的高度文明化成果。「睡獅」因而成為在明治日本時期以動物符號(象、鯨、獅三者為主)形容中國的後起之秀，最終甚至成為在中國語境中自我認知的顯著國族符號(參見附表 1)。

對於「睡獅」淵源的探索，我在上文曾以「梁啟超陷阱」，主張日後對於此議題的探索不應也不須要在梁啟超相關的文獻上打轉。我相信本文所引介分析的日本文獻已充分證明此新研究方向的正確性。當然，作為將「睡獅」引進中文語境的第一人之梁啟超，仍然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尤其當我們再仔細品味他以「哀時客」的筆名，描述所謂曾紀澤口中的睡獅，最終的命運即是瓦解崩壞，邁向最終毀滅死亡。在剛剛經歷百日維新的挫敗，甚至得被迫流亡至日本的梁啟超，事實上否定了曾紀澤對於中國的樂觀期盼。梁啟超筆下的「睡獅」並不是將醒或已醒之獅，而是如同大隈口中的「睡獅」，其實是「早已毫無鼻息、四肢僵硬的老獅」。其所不同的是，梁啟超是以局內人之心境，藉由明治日本論述所創造出的「睡獅」符號，沉重地看待老大帝國的衰敗將亡的身影；相反地，催生「睡獅」誕生的甲午以降的日本公共論述，卻是利用它作為嘲弄中國的假象，作為被日本論述再現的特定意義「他者」(狀似強大，實則衰敗的中國)，從而彰顯因為甲午勝戰而志得意滿的新興日本。兩者主客異位的結果，以及時空環境的差異性，造成了「睡獅」具有不同的論述功用和意涵。

⁷⁷ 大隈重信，《日支民族性論述(前篇)》，頁12。原文為：「其結果支那の真相は世界に遺憾無く暴露されたが、暴露されて見ると、豈圖らんや眠れる獅子では無くして、息を取り四肢既に冷なる老獅であつた。」

最後，耐人尋味的是，在梁啟超之後的各類中文引用睡獅符號的論述，幾乎都是以正向樂觀的意涵定義此符號，似乎又比較像回到曾紀澤的「先睡後醒論」的樂觀調性。更有甚者，時至今日，中國的睡獅相關論述，經常流行著迷此說乃是出於西方人，尤其是拿破崙之口，用來恭維中國的說法。如果本文的研究分析，能夠讓我們更清楚明白一百多年前，誕生於甲午戰爭時期的日本公共論述的「睡獅」，在當時之符號意涵和論述功用和現在大不相同，那麼「睡獅」符號在被引入中國之後，長期以來卻具有正面意涵的強烈對比現象，這樣的歷史發展或許不禁令人莞爾；但從另一角度而言，它的曲折且富戲劇性的符號意涵演變史，也無疑充分展示了跨語境和跨文化的知識符號傳播的高度複雜性和曖昧性。

(後記: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109-2410-H-004-147-MY2〉的研究成果。我要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委員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和李翊煊和李侑儒同學在日文文獻解讀上的協助，以及許慈佑同學幫忙校訂和製作圖表。同時我要特別感謝日本愛知大學的黃英哲教授和京都大學石川禎浩教授幫忙我找到若干重要的日文資料；尤其是石川禎浩教授不僅親自為我檢索重要資料，也提供了他個人對於此研究課題的珍貴建議。在此全球疫情長期不安的情況下，他們的热情協助讓我深刻感受到來自遠方老友的温暖情誼。最後，我的愛犬Maggie在今年四月底去當小天使了。我要感謝她在將近十八個年頭的歲月中，為我們全家帶來數不清的歡樂時光。她的純真良善讓我得以體會到學術生涯外的真善美。這篇文章可謂是在慢慢克服對她難以平復的思念心情下，才得以逐步完成。我相信她如今已在天國無邊無境的草原上盡情奔跑，自由自在……This paper is dedicated in loving memory of her!)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中文書目

-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 王今，〈龍與獅——晚清國族想像及其論述變遷〉，《漢語言文學研究》，第2期(開封，2019.06)，頁54-62。
- 王美平，〈甲午戰爭前後日本對華觀的變遷——以報刊輿論為中心〉，《歷史研究》，第1期(北京，2012.02)，頁143-161。
- 王俊英，《日本明治中期的國粹主義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 王學廉譯，〈如後患何〉，《國聞報》(天津)，1898年3月22日。
- 石川禎浩，〈「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告示牌問題考〉，收入黃克武主編，《第三屆漢學會議論文集：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 石川禎浩，〈晚清「睡獅」形象探源〉，《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廣州，2009.10)，頁87-96。
- 石川禎浩，〈梁啟超與文明的視點〉，收入氏著，袁廣泉譯，《中國近代歷史的表與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 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
- 李國俊編，《梁啟超著述繫年》，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
- 施愛東，〈拿破崙睡獅論：一則層累造成的民族寓言〉，《民族藝術》，2010年第3期(南寧，2010.09)，頁8-16。
- 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 郭偉其，〈醒獅與猛虎：重讀何香凝的象徵圖像〉，《藝術史研究》(廣州，2020.12)，頁55-73。
- 單正平，〈近代思想文化語境中的醒獅形象〉，《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天津，2006.07)，頁29-36。
- 單正平，《晚清民族主義與文學轉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曾紀澤，〈中國先睡後醒論〉，收入龍應台、朱維錚編注，《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
- 楊瑞松，〈從「眠獅」到「睡獅」：梁啟超睡獅說淵源新論〉，《思與言》，第1期(臺北，2016.03)，頁231-265。
- 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政大出版社，2016。
- 齊全編，《梁啟超著述及學術活動繫年綱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 劉德隆、朱禧、劉德平，《劉鶚小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 劉蕙孫，《鐵雲先生年譜長編》，濟南：齊魯書社，1982。
- 稻葉君山著，但燾譯訂，《清朝全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2015。
- 蔣逸雪，《劉鶚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80。
- 鍾淑惠，〈從圖像看日本對甲午戰爭的宣傳〉，《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3期(臺北，2015.05)，頁45-82。

(二) 外文書目

- 〈清國の攪眠如何〉，《日本》(東京)，1894年12月10日，頁4。
- 〈清國外交の活歷史〉，《東京日日新聞》(東京)，1905年11月5日。
- 〈清國鐵道〉，收入三好守雄編，《日清事件時事問題輿論演說》，東京：學友館，1895。
- Cohen, Paul.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 Curzon, George. *Problems of the Far East: Japan-Korea-China*.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4.
- Elman, Benjamin. “The ‘Rise’ of Japan and the ‘Fall’ of China After 1895,” in *The Chinese Chameleon Revisited: From the Jesuits to Zhang Yimou*. Edited by Zheng Yangwen,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3.
- Fitzgerald, John. “‘Lands of the East Awake!': Christian Motifs in Early Chinese Nationalism,” 收入黃克武、張哲嘉主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 Heinrich, Larissa. *Chinese Surplu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Heinrich, Larissa. *The Afterlife of Images: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Keene, Donald.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and Its Cultural Effects in Japan,” in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Japanese Culture*. eds. Donald H. Shivel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121-175.
- Norman, Henry. *The Peoples and Politics of the Far East: Travels and Studies in the British, French, Spanish and Portuguese Colonies, Siberia, China, Japan, Korea, Siam and Malaya*.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95.
-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 Tanaka, Stefan. *Japan's Orient: Read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Tseng, “China, the Sleep and Awakening,” 附錄於：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頁149-161。
- Wagner, Rudolf. “China ‘Asleep’ and ‘Awakening’. A Study in Conceptualizing Asymmetry and Coping with It,” *Transcultural Studies*, 1 (March, 2011): 4-139.
- Yang, Jui-sung. “Where Does the ‘Lion’ Come From? On the Origin of Liang Qichao’s

“Sleeping Lion” Symbol,”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Vol.24, Issue, 2(October, 2017): 131-145.

一笑子，〈清國の真相〉，《日本》(東京)，1894年11月7日，頁1。

三文字屋金平，〈支那帝國之末路〉，東京：右文社，1894。

大隈重信，〈清國問題〉，《東洋》，第二號(東京：經緯社，1901.04)，頁47-58。

大隈重信，〈三たび東方の平和を論ず〉，收入早稻田大學編，《大隈重信演說談話集》，東京：岩波書店，2016。

大隈重信，《日支民族性論述(前篇)》，東京：公民同盟出版部，1915。

大澤龍，〈支那論〉，《中外時論》，第二號(東京：精神社，1898.02)，頁8。

久野淳一，〈渡邊修二郎と横濱〉，《横濱開港資料館紀要》，第33期(横濱，2015.03)，頁1-5。

石川禎浩，〈眠れる獅子(睡獅)と梁啓超〉，《東方學報》，第85冊(京都，2010.03)，頁479-509。

扶桑子，〈清國鐵道〉，《扶桑新聞》(名古屋)，1894年12月16日，頁1。

松本三之介，《近代日本の中國認識：徳川期儒學から東亜協同體論まで》，東京：以文社，2011。

岸田吟香，〈吟香翁書牘之續〉，《朝野新聞》(東京)，1880年5月23日。

島田三郎，〈支那に対する政策何似〉，《日本人》，卷14(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83)(原出版項為東京：政教社，1896.10)，頁281-283。

桂枝雀，《日清事件大當新歌大全》，大阪：名倉昭文館，1894。

柴四朗，《佳人之奇遇》，東京：岩波書店，2006。

渡邊修二郎，《對清對歐策》，靜岡：奉公會，1894。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社，1914。

福澤諭吉，《兵論》，東京：飯田平作，1882。

ダヴィドソン(Davidson)，〈支那と日本〉，收錄於大原嘉吉譯述，《日清戰爭歐米評論》，大阪：林莊太郎，1894，頁165-171。

(三)網路資料

EP president says “China is a lion awakening”

<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xw/t261759.htm> · 擷取日期：2021年6月20日。

MIT Visualizing Cultures,

https://visualizingcultures.mit.edu/throwing_off_Asia_02/visnav_ii_ihtml,

擷取日期：2021年6月7日。

Lord Curzon,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Lord-Curzon>, 擷取日期：2021年9月20日。

Norman, Henry(first baronet) 1858-1939,

[https://collection.sciencemuseumgroup.org.uk/people/ap24859/norman-first-](https://collection.sciencemuseumgroup.org.uk/people/ap24859/norman-first-baronet)

[baronet](https://collection.sciencemuseumgroup.org.uk/people/ap24859/norman-first-baronet), 擷取日期：2021年9月20日。

任仲平，〈百年輝煌，砥礪初心向復興：寫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2021年6月7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21/0628/c40531-32142075.html>,

擷取日期：2021年7月11日。

葉靖斯，〈習近平總結法國訪問：中國「睡獅已醒」〉，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03/140328_china_france_xi,

擷取日期：2021年6月7日。

附表1：目前研究所發現的明治日本時期以象、鯨、獅和睡獅形容中國的文獻資料

動物 形象 年代	象	鯨	獅(睡獅除外)	睡獅
1880	岸田吟香：「李鴻章党の説益す行はれ遂に電信を架し鉄道を築き、鉦山を発掘し、器械を製造し、全土凡百の物、西洋の民法を悉く採りし、 俄に大象の眠りを醒し候はば、是れ迄傍に戯れ居たる虎も俄かに尾を巻いて奔驅せるを得ざるに至り。 」(『吟香翁書牘之續』，《朝野新聞》(東京)・1880年5月23日)			

附表1：(承上頁)

1882			<p>福澤諭吉：「支那人の體力は、日本人に劣る者に非ず。斯る體力を有しながら、尚其軍人の怯懦なるが如くに見ゆるは何ぞや。即ち前にも云へる如く、人の怯懦なるに非ず、唯兵制の不完全なるが為に、然るのみ。之を譬へば、今の支那國に兵制の整頓せざるは、獅子にして爪牙を欠く者の如し。一旦これを生じて、其爪を磨きその牙を鋭くしたらんには、東洋諸國よく之に當るものはなかる可し。或は、大象にして獅子の爪牙を具る者と云ふも可ならん。今日、既に其爪牙の一部分を磨きたり。我士人は尚これを怯懦なり。</p>
------	--	--	---

附表1：(承上頁)

1882			<p>とし輕侮し了らんと欲するか。吾輩は士人と共に枕を高するを得ざる者なり。」(《兵論》，東京：飯田平作，1882，頁29-30)</p>	
1891			<p>柴四朗：「清人、平生驕傲の氣益々長じ、大言して曰く、鏖戦して欧の雄邦佛國を破り、東洋の強邦日本に勝ち、朝鮮に於ける舊權を恢復せり。宇内又恐るに足るものなしと。勇氣百倍、病獅再び風に嘯くの態あり。」(《佳人之奇遇》，東京：岩波書店，2006，卷10，頁505)</p>	
1894	<p>1. 三文字屋金平：「斯くて此病める象の如き廢疾不具の者大國は、年一年と攻策に其地</p>	<p>1. 渡邊修二郎：「從來歐人ノ支那國及び其人民ヲスルヤ甚ダ其實ヲ得ザルモノアリ、</p>		<p>1. 一笑子：「人口を論ずれば一國にして世界の人口四分の一以上を有るのみ、西人故に</p>

附表1：(承上頁)

1894	<p><u>域えお窄められをがらも、猶ほ且つ余命喘々として暫く絶望の老驥を保ちつづけつつありたりしが。</u>一且死の手の上に握られたる渠の運命は、如何なる手段も再び之を恢復すること能はざるものなるにや、遂に一千九百四十四年=明治七十四年=の末に至て、渠老朽國の遷乎たる地劃は、亞細亞地理圖の上より抹消し去られ、『支那帝國』なる一語は、唯歴史的のものとして、僅に紀念を近世戦史の上_上に止ムルに至れり。』(『支那帝國之末路』，東京：右文社，</p>	<p><u>往々支那ヲ以テ『睡レル獅子』或ハ『睡レル鯨』ニ此セリ、何ツ其事情ニ暗キヤ</u> 余ハ支那ヲ以テ重傷ヲ負ヘル大鯨ニ比セツト欲スルナリ。(『對清對歐策』，静岡：奉公會，1894，38-39)</p> <p>2. 渡邊修二郎：「到底歐羅巴諸國ニ對シテ戰爭ヲ公布スベキ國ニアラズ 鯨ノ眠レル狀況ハ能ク支那ニ警フルルヲ得ベシ、而シテ一朝躍動ヲ試ムルルアラハ從來他ヨリ受ケタル威嚴ハ之ガタメニ消失シ、終ニ安眠ヲ貪ルル能ハザルニ至ルハ、夙ニ支那ノ了知スル所ナルガ故ニ、</p>		<p><u>日く支那は眠れる獅子の如し一瞥すれば必ず獲を呑み虎を食はんと、日清構難の始めに当たりて両国の事情に通曉すと自称する西洋人と雖ども多くは此等の妄想に眩惑し最後の戦捷は必ず支那帝國に歸すべきを断言したり」</u> (『清國の真相』，《日本》(東京)，1894年11月7日，頁1)</p> <p>2. 渡邊修二郎：「從來歐人ノ支那國及ビ其人民ヲ觀察スルヤ甚ダ其實ヲ得ザルモノアリ、<u>往々支那ヲ以テ『睡レル獅子』或ハ『睡レル鯨』ニ此セリ、何ツ其事情ニ暗キヤ</u>、余</p>
------	--	--	--	--

附表1：(承上頁)

1894	<p>，1894，頁8)</p> <p>2. 竹越與三郎：「曰く、清國は死せんとせるにあらざ、眠れるなり。睡眠は皇帝の切愛せる北京宮殿の焼打せられたる兵火の光に照らされて覺めたりと、吾人は清國を以つて死せんとするものなりとも為さず。また眠れるものなりとも為さず。故にまた睡眠より醒めつつあるものとも為さず。彼は象種の如き大動物也。其生長は日進月歩ならざるが故に、人の注目を惹くほどにあらざと雖も、確かに内乱、外患、苛政、酷刑、収斂の中に於ても、其</p>	<p>支那ノ好ム所ハ世界ヲメ支那一度崛起セバ如何ナル事件ヲ惹起スルヤモ知ルベカラザルヲ理想像セシムル傍ニ於テ其安眠ヲ為ス在リ。詳言セバ支那人ハ一面ニ孔子ノ野蠻主義ヲ奉ジテ其安ヲ貪リ、他ノ一面ニハ『眠リテ覺メントスル支那』ト題スル反古様ノ書ヲ著シテ其虚聲ヲ張レリ。此篇ハ故曾紀澤侯ガ數年前『エーシアチック・クーター』雜誌ニ載セテ世ニ公ニシタルモノナルガ、試ニ之ヲ一閱セバ支那ハ警戒心ニ富ミ且ツ不屈ノ精神ヲ以テ今其進歩ヲ</p>	<p>ハ支那ヲ以テ重傷ヲ負ヘル大鯨ニ比セツト欲スルナリ。」(《對清對歐策》，靜岡：奉公會，1894，頁38-39)</p> <p>3. 佚名譯者：「<u>清國は睡れる獅子の如しと、是れ果して真なるか、睡れるものは早晩必ず驚起せざるべからず</u>。問題は實に此点にあり。」(《清國の攪眠如何》、《日本》(東京)，1894年12月10日，頁4)</p> <p>4. 扶桑評論子抄録：「<u>清國は睡れる獅子の如しと、是れ果して真なるか、睡れるものは早晩必ず驚起せざるべからず</u>。問題は實に此点にあり。」(《清國鐵道》，原刊於《扶</p>
------	---	--	--

附表1：(承上頁)

1894	<p>生長を廃せざりし也。」(《支那論》, 東京: 民友社, 1894, 頁40)</p>	<p>為スモノナリト記セリ」(《對清對歐策》, 静岡: 奉公會, 1894, 頁42-43)</p> <p>3. 英國海軍將官ユラム氏: 「<u>日支の戰爭は恰も是れ蝦と鯨の戰爭の如しと謂ふべし、</u> <u>輕いかばそに勇猛なり</u> <u>りそも、豈に夫れ終に鯨を滅却し得べけんや、其形體の大小固と大に異なればなり</u>」(〈英國海軍將官の日清軍略談〉, 原出自明治27年9月7日英國タイムス新聞所載, 收入大原嘉吉譯, 《日清戰爭歐米評論》, 大阪: 林莊太郎, 1894, 頁126-127)</p>		<p>桑新聞》, 第1269號, 明治27年12月16日, 收入三好守雄編, 《日清事件時事問題輿論演說》, 東京: 學友館, 1895, 頁44)</p>
------	---	---	--	--


附表1：(承上頁)

1894	4. <u>Davidson</u> 教授(引述 Henry Norman 論點)： 「 <u>支那は恰かも鯨の眠れる有様に比ぶべし</u> 」 若し一朝飛躍を試むることあらば、從來他より受けられる威嚴は之がために消去り、終に安眠を貪ること能はざるに至らんこと、夙に支那の了知する所ならん、是を以て支那の欲する所の者は世界をして支那一れび崛起せば、如何なる世界的大紛争大戦乱を引起すやも知るべからざることを想像せしめながらに、自ら安眠を貪るにあり」(〈支那と日本〉、收入大原	
------	---	--

附表1：(承上頁)

1894	<p>身輪鐵太郎：「今之を動物に譬(たと)へて申しませうなら、日本は獅子で清國は象であります。象は如何にその體がデクデク大きくありましても一たび獅子の激怒(いかり)に触れますれば、條(たちま)ち引き裂れてしまふこととであります。更らに又これを産海動物に喩(たと)へて申せば、日本は鯨(しやちほ)こ)でも、清國は鯨であります。鯨は如何にその體(なり)が巨大で、一びた(原文</p>	<p>嘉吉譯述，《日清戰爭歐米評論》，大阪：林莊太郎，1894，頁166)</p>		
1895	<p>身輪鐵太郎：「今之を動物に譬(たと)へて申しませうなら、日本は獅子で清國は象であります。象は如何にその體がデクデク大きくありましても一たび獅子の激怒(いかり)に触れますれば、條(たちま)ち引き裂れてしまふこととであります。更らに又これを産海動物に喩(たと)へて申せば、日本は鯨(しやちほ)こ)でも、清國は鯨であります。鯨は如何にその體(なり)が巨大で、一びた(原文</p>	<p>身輪鐵太郎：「今之を動物に譬(たと)へて申しませうなら、日本は獅子で清國は象であります。象は如何にその體がデクデク大きくありましても一たび獅子の激怒(いかり)に触れますれば、條(たちま)ち引き裂れてしまふこととであります。更らに又これを産海動物に喩(たと)へて申せば、日本は鯨(しやちほ)こ)でも、清國は鯨であります。鯨は如何にその體(なり)が巨大で、一びた(原文</p>		<p>佚名：「支那は眠れる獅子の如しと云ふたとへがあるが、これは果たして真であるのが、<u>睡れるものなら早晩警醒ないとが</u>ありませうの。」(《清國鐵道》，原刊於《扶桑新聞》，第1269號，明治27年12月16日，收入三好守雄編，《日清事件時事問題興論演說》，東京：學友館，1895，頁44)</p>

附表1：(承上頁)

<p>1895</p>	<p>有誤，應為たび(鱧)の突貫を受けては、忽(たちま)ちその胴腹を劈(つんざか)かれてしまふことでありませす。」(《日清戦争の警喻》・收入麟兒堂主人，《子供新演説》，東京：近園書店，1895，頁46-47)</p>  <p>日本獅vs.清國象</p>	<p>誤，應為たび(鱧)の突貫を受けては、忽(たちま)ちその胴腹を劈(つんざか)かれてしまふことでありませす。」(《日清戦争の警喻》・收入麟兒堂主人，《子供新演説》，東京：近園書店，1895，頁46-47)</p>	
<p>1896</p>	<p>島田三郎：「死したる獅子・眠れる象、是れ等の評言は今更に讀はずもがな。吾人は其死したると眠れる</p>		<p>島田三郎：「死したる獅子・眠れる象、是れ等の評言は今更に讀はずもがな。吾人は其死したると眠れる</p>

附表1：(承上頁)

1896	<p>との孰れを問はず、今は唯た此尠大なる老帝国に対して如何の位置を取るべきかの問題を講究するの必要に迫まれる観るのみ。』(〈支那に対する政策何似〉，《日本人》，卷14(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83，頁281)(原出版項為東京：政教社，1896.10)</p>		<p>との孰れを問はず、今は唯た此尠大なる老帝国に対して如何の位置を取るべきかの問題を講究するの必要に迫まれる観るのみ。』(〈支那に対する政策何似〉，《日本人》，卷14(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83，頁281)(原出版項為東京：政教社，1896.10)</p>	
1898				<p>大澤龍：「說者曰：『支那政府猶抱不療之病疾者，雖國手大家不能治之。而支那人民又猶遊惰及於晚年者，希其懷臂奮起，樹革新之功，不異於百年待河清焉。往年曾紀澤論支那比之於眠獅，當時泰西諸國，</p>

附表1：(承上頁)

1898				<p>未詳其事情，以曾氏之論為真，然而及於甲午之役，連戰連敗。支那之真面目，始暴露於中外，於是乎羣之畏而遂巡者，爭先奮之，如英俄法德是也。」(〈支那論〉，《中外時論》，第二號(東京：精神社，1898.02)，頁8-10)</p>
1899		<p>梁啟超：「哀時客隱几而臥，鄰室有甲乙丙丁四人者，咄咄為動物談，客傾耳而聽之。甲曰：吾昔游日本之北海道，與捕鯨者為伍。鯨之體不知其若干里也，其背之凸者，暴露於海面，面積且方三里。捕鯨者割其背以為居，食於斯，寢於斯，日割其肉以為</p>		<p>梁啟超：「哀時客隱几而臥，鄰室有甲乙丙丁四人者，咄咄為動物談，客傾耳而聽之。……丁曰：吾昔遊倫敦博物院，有人製之怪物焉，狀若獅子，然匭臥無生動氣。或語餘曰：子無輕視此物，其內有機焉，一撥振之，即張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敵</p>

附表1：(承上頁)

1899	<p>膳，夜然其油以為燭，如是者殆五六家焉。此外魚蝦蟹鱸貝蛤，緣之嚼之者，又不下千計。而彼鯨者冥然不自知，以避以泳，儼然自以為海王也。余語漁者：是惟大故，故且且伐之，而曾無所於覺。晨不及五日，將隕於吾肆矣。」(《動物談》，《清議報》(橫濱)，1899年4月30日)</p>		<p>也。余詢其名，其人曰：英語謂之佛蘭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紀澤，譯其名謂之睡獅，又謂之先睡後醒之巨物。余試發其機，則動力未發而機忽坼，驚吾手焉。蓋其機廢置已久，既就鏽蝕，而又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機，則此佛蘭金仙者，將長睡不醒矣。惜哉！」(《動物談》，《清議報》(橫濱)，1899年4月30日)</p>
1899			

附表1：(承上頁)

1899	<p>膽，夜然其油以為燭，如是者殆五六家焉。此外魚蝦鱉蠃貝蛤，緣之囓之者，又不下千計。而彼鯨者冥然不自知，以避以泳，偃然自以為海王也。余語漁者：是惟大故，故且且伐之，而曾無所於覺。是不及五日，將墮於吾肆矣。」(〈動物談〉，《清議報》(橫濱)，1899年4月30日)</p>	<p>也。余詢其名，其人曰：英語謂之佛蘭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紀澤，譯其名謂之睡獅，又謂之先睡後醒之巨物。余試撥其機，則動力未發而機忽拆，擊吾手焉。蓋其機處置已久，既就鑿蝕，而又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機，則此佛蘭金仙者，將長睡不醒矣。惜哉！」(〈動物談〉，《清議報》(橫濱)，1899年4月30日)</p>	<p>也。余詢其名，其人曰：英語謂之佛蘭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紀澤，譯其名謂之睡獅，又謂之先睡後醒之巨物。余試撥其機，則動力未發而機忽拆，擊吾手焉。蓋其機處置已久，既就鑿蝕，而又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機，則此佛蘭金仙者，將長睡不醒矣。惜哉！」(〈動物談〉，《清議報》(橫濱)，1899年4月30日)</p>
1901			<p>大隈重信：「清國は新疆を回復するを得、爾時曾國樞の子曾紀澤の如きは、欽差大臣として出て、外に在りたりしに、一日清國は猶睡れる獅子の如しとの演</p>

附表1：(承上頁)

1901			<p>説を爲して、大に歐洲列強の注意を惹き……」, (〈清國問題〉, 《東洋》, 第二號(東京: 經緯社, 1901.04), 頁49)</p>
1905		<p>佚名:「清國近世の一大外交家として上下の尊崇盛名今尚赫々の曾紀澤氏が、……當時南洋第一の洋學者たる何啟氏は曾紀澤の眠獅説を駁して清國は眠獅にあらず死獅なりと論難したる時、曾紀澤は答へて曰く、今や列強清國の内情を知らざる間は是れ実に清國は眠獅なりと言ひたる。」(〈清國外交の活歴史〉, 《東京日日新聞》</p>	<p>佚名:「清國近世の一大外交家として上下の尊崇盛名今尚赫々の曾紀澤氏が、今より十數年前、清國を列強に紹介するに常り、彼の有名な論策に曰く、清國は眠れる獅子なりと、即ち臥龍の二字より翻譯したる眠獅の二字を以て當時歐亞外交社會を風靡し、露國外務大臣ゴルチャコフ氏も之が為めにイリ条約に於て曾紀澤</p>

附表1：(承上頁)

1905			(東京), 1905年11月5日)	の要求を容る、に至れり、當時南清第一の洋學者たる何啟氏は曾紀澤の眠獅説を駁して清國は眠獅にあらず死獅なりと論難したる時、曾紀澤は答へて曰く、今や列強清國の内情を知らざる間は是れ実に清國は眠獅なりと言ひたる。」(『清國外交の活歴史』(東京)日新聞) (東京), 1905年11月5日)
------	--	--	-------------------	---

**Toward a Critical Appraisal &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 of the “Sleeping Lion”:
The Birth of “Sleeping Lion” Discourse in Meiji Japan**

Yang, Jui-su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t has long been said that Westerners, Napoleon in particular, have characterized China as a “Sleeping Lion,” which is destined one day to become a rising power. However, numerous examples of critical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is issue have all pointed out that no piece of solid evidence has been found to support the popular idea that Napoleon referred to China as a “sleeping lion.” Instead,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Liang Qichao might have been the first thinker to characterize China in terms of the sleeping lion symbol in 1899. However, my own study on this issue, published in 2016, has demonstrated that Liang might have been inspired by earlier Japanese discourses in using the sleeping lion symbol. Unfortunately, many follow-up studies are still occupied in the “Liang Qichao trap,” attempting to no avail to figure out the origin of the symbol by focusing mainly on issues related to Liang’s own discourses. In this study, I have critically examine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se arguments centering on Liang Qichao. Moreover, I have presented a number of pieces of solid textual evidence in Japanese to reveal that the “China as a sleeping Lion” metaphor actually originated from discourses in Meiji Japa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Most importantly,

I have argued that both Marquis Tseng's discourse on China and the triumph of a rising Japan played significant roles in contributing to the birth of the "Sleeping Lion," which was utilized within Meiji "Orientalist" discourses to symbolize the "paper tiger" façade of the Qing empire. By clearly tracing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leeping lion symbol in trans-lingual and trans-cultural context, this study illuminates the complexities and ambiguitie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ideas and symbols.

Keywords: Sleeping Lion, Liang Qichao, Marquis Tseng, First Sino-Japanese War, Meiji Japan

